

看见地方

2019

社区伙伴编

比邻
泥土香

看见地方——比邻泥土香

2019

社区伙伴编

东方出版社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ISBN 978-7-5207-1422-8



9 787520 714228 >


定价：32.00元

看见地方
——比邻泥土香 2019

社区伙伴 编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看见地方：比邻泥土香：2019 / 社区伙伴编. — 北京：
东方出版社，2020.3

ISBN 978-7-5207-1422-8

I . ①看 ... II . ①社 ... III . ①生活方式—中国—现代
—文集 IV . ① D669.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32172 号

看见地方——比邻泥土香 2019

(KANJIAN DIFANG——BILIN NITU XIANG 2019)

责任编辑：韩封三祝 张晓雪

封面设计：黄海澜

插 画：黄海澜

版式设计：陆迦莘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北里 51 号

邮 编：100028

印 刷：广州百思得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202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2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6

字 数：109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207-1422-8

定 价：32.00 元

发行电话：(010) 85924641 85924738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请拨打电话：(010) 85924738

如有书稿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85924735

力从地起

(代序)

曾经听说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国外原住民朋友因为要进城办事，坐上了一台汽车，坐到半路突然跳下车来。其他乘客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说：“车子跑太快了，我的灵魂追不上。我要下车走走，等我的灵魂赶上来。”

在“风、火、水、土”的宇宙观中，土地有扎根、支持、力量的面向，也代表了大地母亲、养育、丰盈等元素。所以我们会说，“万丈高楼平地起”、“落地生根”以及“力从地起，拳从心发”。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离土地却越来越远。城市里的居民，每天都在云雾中穿梭和生活，真的是命悬半空。如今，我们要去一个地方，早就不用走路了，从电动扶梯到汽车到高铁到飞机，双腿的功能所剩无几。我们能去到更多更远的地方，而所需的时间却较过去短太多了。再想想我们的手机、计算机、互联网、云端、5G……无怪乎我们对现代的生活好像充满了无力感。

要改变，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比如，可以在生活中尝试园艺、耕种，也可以多接触泥土、做陶艺，亦或是赤脚在树林漫步。更简单的则是多步行，用心走好每一步。在用心、专注走好每一步的同时，我们会发现身体的触感会变得更灵敏，平素乏味的、有如过眼云烟的城市空间，瞬息转换成充满意义的、与自己相关的生活场景。

与土地联结，接地气了，自然就有了力量。这一次编辑团队制作了“看见地方”专题，并收录了来自不同地方实践者的分享，大概就是想从殊途同归的进路切入，与读者分享我们对于社会改变的思考。扎根地方，用心实践，让新生活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演化的现实。

《比邻泥土香》始创于2008年，是由社区伙伴制作的可持续生活书籍，旨在分享、推广可持续生活的理念和行动经验。本书供可持续生活的探索者与行动者阅读。今年的《比邻泥土香》由陈宇辉、邓文嫦、郭婷、贾丽杰、梁笑媚参与编辑，感谢东方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提供大量的帮助，同时也感谢所有的作者和对本书编辑出版提供帮助的伙伴，没有你们的支持本书也无法面世。

《比邻泥土香》编委会

2019年6月

目录

第一部分 专题——看见地方

好生活 好风光 好地方	陈宇辉	2
一个老广州的自白	甘宁	4
大理上关，正在改变的生活	缪芸	10
奈何制衣——白裤瑶服饰制作的地方性文化动因	汪斌	20
最好的时光都放在这里了——北京回龙观“幸福树”下的阅读生活	霍伟亚	28
看见庶民之美——台湾三重、芦洲移动与劳动的故事	庄妙慈	38
感受地方	陈顺馨	48

第二部分 行动者

堆肥笃农家：堆出健康土壤，堆出农业未来	彭月丽	54
脱掉包装的买卖关系	凤娇	60
生命，是不断自我认识与重建的过程	陈云芳	68
安德润大叔的选择——菲律宾乡村建设研学的观察与思考	何龙翔	74

第三部分 解读

《鸡》——叩问现代生活	顾晓峰	84
-------------	-----	----

专题——看见地方

第一部分

好生活 好风光 好地方

文 | 陈宇辉

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香港,我有一种强迫症。每当我在媒体上(如外国杂志、豆瓣网友的分享)看到有“声称”拍自香港的照片,我总会要求自己在规定时间内辨识出拍摄那张照片的具体位置。有时我能迅速讲出具体是哪条街道、哪个海滩、哪个社区,有时我也能大概猜出照片拍自哪个区域。由此我发现,即便是所谓的国际大都会香港,只要我们用心观察,“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差异还是蛮大的。差异不仅反映于路旁树木的高度、行车路的设计、大厦的样子、天际线的风景,甚至可以从照片中的交通工具、学生穿的衣服、挂在行人路旁的宣传海报嗅出些端倪。

我带着这样一种习性,行走在中国内地的城市,依旧发现无穷的趣味——北京市郊的大田,广州市内的河涌,成都街巷中的冰粉摊,贵阳山包包上湿滑的梯级,诸如此类。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都感受着不同地方之间的差异日益被磨平,比如一样的机场商店,一样的高铁站设计,一样的菜式,连电视里播的和手机里看的内容都一模一样。

然而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更令人担心的是,我们对“地方”越来越没有感觉,或者说,我们已渐渐失去了与身处时空的联系,也因此感觉不到何为“地方”。我们好像越来越容易在不同的地方生活,去年还在天津,今年就去了南宁,即便定居一地,也会由于种种原因被迫在同一座城市搬来搬去。更不用提城市的生活冷漠、邻里间的相互不认识、小区的封闭式管理等。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体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我们又好像无时无刻不在跟各种社群沟通互动,虚拟的空间好像成为了真实生活的替代,“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说法竟然以这样的方式回归,难道这就是现代人的宿命?

这一次我们以“看见地方”为专题,与其说是在抗拒宿命,不如说是在差不多要忘记“何谓地方”前的一次再召唤。透过专题中的各篇文章,我们尝试召唤那还埋藏于我们心灵、生活、文化深处

的地方感，并寄望当中的情感让我们有力量从计算机与手机屏幕中走出来，回归我们真实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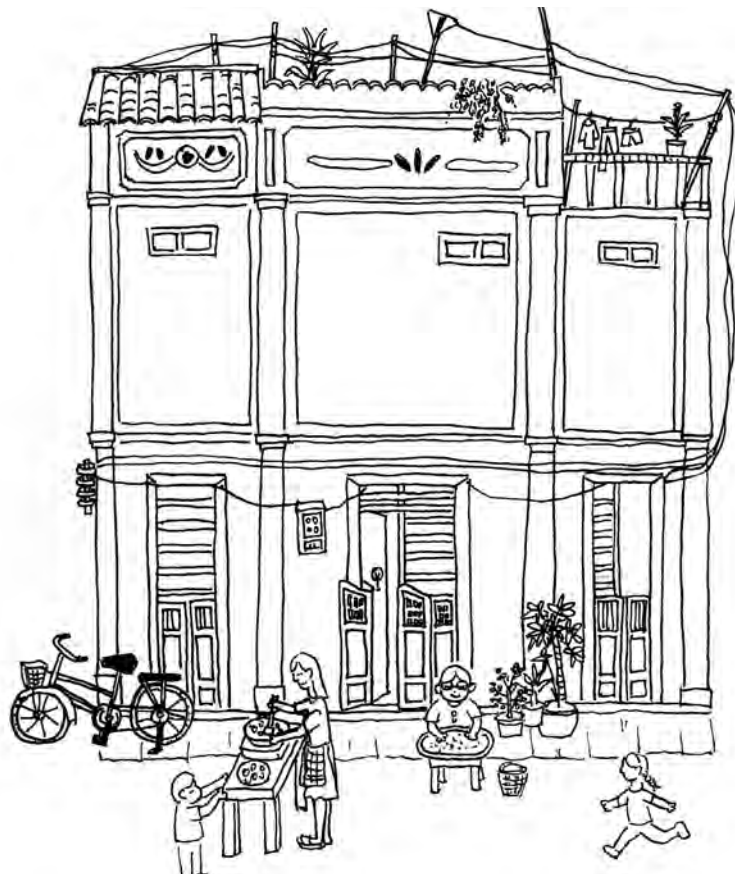
甘宁的文章趣味盎然，对广东人乃至南方人来说更是回味无穷。她从儿时广州老城街头巷尾的生活写起，再分享她长大后曾经生活过的两个村子，岭南的人文自然地景活现眼前，既一饱读者的眼福，也抚慰了游学在外的自己。那边厢从国外学成归来的缪芸去到了云南大理上关村，她笔下的上关村村民正努力应对发展带来的改变，过程中不无挣扎与困惑，因着变化而产生了对地方的情感与责任感，相信是不少朋友心情的写照。年轻学者与社区工作者汪斌则带我们去到广西白裤瑶的村子，看到白裤瑶的妇女如何彼此互助，在与山林、蚕宝宝、植物的亲密互动下，编织出属于她们的衣裳，也编织出属于她们的地方。

与此同时，霍伟亚笔下的北京回龙观社区居民告诉我们，即便是在从无到有、拔地而起只有 20 年历史的新城区，即便是无法知道自己能在北京待多久的北漂，如果愿意努力耕耘，我们还是能与其他居民一起，在水泥地的缝隙中挤出一点点空间生根发芽。来自台北的庄妙慈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个移民的故事，坐落在台北外围的芦荻社区大学面对的社群都不是本地人，他们透过食物、手艺人、社区报来编写一个属于大家的庶民故事，对我们也饶有启发。最后，陈顺馨老师用自己的生命故事与生活体验跟各篇文章及作者对话，书写出她对地方与气候生态、日常生活、文化历史、公共事务等的理解。

陈老师在文章结尾时写道：“精彩的生活经验，呈现不同地方的独特感觉。”好像正是这样呢！“好地方来好风光”，但大地何言哉？因为有人，我们在客观的空间中过着有意思的生活，与天地万物共存共生，自然能展示出不一样的人文与自然地景，让好风光得以生成，也让属于我们的“地方”能够重新被看见。

一个老广州的自白

文 | 甘宁



这两年，我在德国读书和生活，遇到需要自我介绍的时候，我都会不自觉地分享说：我是广州人，我的母语是粤语。其实，可能对方并不知道粤语是中文里的哪家方言，广州位于地球上的哪个角落。然而，我对广州就是有着浓浓的身份认同，如我身上美丽的纹身印记，我愿意它被更多人看见。

话说“老广州”，认识我的人也许会说，你才30岁出头，就敢戴个“老”字在头上！实话说，我觉得我真的够老了，如果廿年树木的话，我这30年还蕴含着上一辈的记忆和足迹。

一条约

就从小时候说起吧。我是在广州西华路长庚三约长大的。事实上这里是我奶奶的家，广府典型的竹筒屋¹。因为妈妈经常到外地工作，所以我大部分的童年时光都在这里度过。在我的脑海里，这房子的主人是奶奶、姑妈、表姐还有我。长庚三约的“约”是如街、巷一类的道路单位，但它是比街或巷都要小的聚居点。当年，长庚三约的一头位于人民路和西华路的交界处，那是一个小高地，所以从西华路的入口处有一道麻石大阶梯，光滑的麻石经年累月已经被踩出一个个凹陷的弧形，遇上下雨天就成了音乐喷泉，因为每下一级石阶就“吧嗒”一下，水花四溅，这是只有孩子才会欣赏的风景。

在这条约，从这个大阶梯再往前走 300 米左右就到下一条街。短短的一段“约”承载着我的很多回忆——最深的印记是味道。当年在大阶梯上面有一档云吞面铺，给我的印象总是热气腾腾的，面汤的香气化为白雾往街上飘，弥漫在空气中，必定将过往的行人逮个正着。说到味道，就不能不提那时的竹筒屋，它是当时城区里最“普通”的房子，鳞次栉比地挤在短短的巷子里。一般有两层楼，除了瓦面做的斜房顶，还有典型的南方住家标配的三件头——矮脚花门、趟栊门和大木门。相比之下，室内可谓“精致”：面积小，楼面矮，没窗户（只有天窗），没有房间，也没有厕所和厨房。那时候，我们一家人就挤在二楼的两张大通铺上，夏天就在一楼打地铺。楼下还有一张床给奶奶睡，在楼梯底有布帘遮挡，是放痰盂的地方，小便就在痰盂解决。因为家家户户的状况都差不多，所以全部人家都是在街上煮食，在街上乘凉，在家门口做手工活，街道俨然成了各家各户的厨房和客厅。人们走过街道的时候，就如穿堂过室，各家的家务都一览无遗。当时，作为小朋友的我，从巷头回家，见人都要打招呼，因为整条街上的人都认识你。左边叫一声“四嫂”，右边叫一声“梁伯”，左边再叫一声“八姑”，右边再叫一声“莲姨”，好不容易才回到家，叫一声“奶奶”“姑妈”，为这一路的招呼画上句号。逢年过节，街道从来都不缺节日气氛，一路上可谓精彩绝伦：这家在杀鸡，那家在斩烧肉，这家在清蒸鲩鱼，那家在炒粉丝，看得眼珠子都快要掉出来，口水更加是从巷头流到巷尾，各种香味编织交错，各种声音此起彼伏，如果这时候走过，总会被招呼“吃饭啦”“埋黎（过来）坐啦，加双筷子咋”“过黎（来）饮几杯，贺贺佢（庆祝它）”！

1. 竹筒屋，因其门面窄小，纵深狭长，形似竹筒而得名，也叫“商铺屋”。广州的竹筒屋产生于 19 世纪工商业快速发展的时期，当时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内地皮开始紧张，地价上升，在这种形势下，商住两用的竹筒屋应运而生，成为近代广州传统住宅形式之一。

在这道巷子里，各人真实地做着自己，真实地生活，每家每户都或紧或松地相互交织，你尽情地演绎着你的生命故事，也成为了我的生命故事的一部分。

因为街道成了公共空间，作为小朋友的我，要打发闲暇时间就会往各家里钻，首先在八姑那里帮忙“拉沙士”——用夹子把碎布重新拨回棉花状，给专人收购用于清洁机器；然后到莲姨家穿珠片；再到对面家玩过家家；或者玩最有难度的捉迷藏——因为需要到不同的家里把人揪出来，运气不好的时候会被打赏一顿痛骂。所以，做孩子的总闲不下来，如果哪天我只待在家里，家人会怀疑我是不是生病了。

在这道巷子里，各人真实地做着自己，真实地生活，每家每户都或紧或松地相互交织，你尽情地演绎着你的生命故事，也成为了我的生命故事的一部分。

可惜的是，这段在长庚三约的生活经历在我五年级时戛然而止，那一年，它被开发商征收了。现在的西华路，在广州也算得上是小明星，近十几年来这里的本土饮食小店为它打开了名堂，什么萝卜牛杂、芝麻糊、肠粉、云吞面应有尽有。如今每每走过，我心里还是惦记那条短短的只有 300 米的小巷子，缅怀那种回到巷子就是回到家的感觉。

一个庄

成年后，我嫁入了广州郊区的一个庄。在那里，庄是比村还要小的村落单位，一个庄通常就聚居一房人。回家的时候，就如历史重演，得向在街上的人左右打招呼，因为他们都是我家亲戚。要记住他们的称呼，是一大挑战。同时，年纪轻轻的我就被称为“大婆”，两个毛头娃儿就被尊称为“大叔”，没办法，因为我家相公的辈分大。

在庄里，家族的公共空间是一间祖屋。庄口有一棵上百年的大榕树，在重大节日，各家各户都要去祖屋上香奉神，最后一站必是到大榕树下拜一拜，才算礼成。而到了清明节，更需要全房人出动，到祖坟扫墓。在外打工的人能回来的都会赶回来，各家带上元宝蜡烛香、烧肉艾糍白饭、白酒、茶水，还有锄头和镰刀，浩浩荡荡上山去。山是荒山，需要排头兵用镰刀开路，一路老老少少互相扶持前后跟随。到山上后，集体铲杂草、除乱木、平整坟头，然后轮流上前拜祭，最后点上大鞭炮作为结束。可以说这一天比新年还要隆重，因为新年是家庭过的节日，而清明则是一房人一起过的节日。因为



节日和仪式，让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有了回家的节奏，回到那片自然的山林中去，回首那些古老的灵魂。

到了过年，庄里的人家会做糖环过节。做糖环的功夫一点也不少，先要用柴火烧大锅，炒热糯米粉后，徒手趁热搓粉，然后捏出造型，再下油锅炸。以前每年春节，家家户户都会做，各家轮流来帮忙。红白喜事的时候也一样，在家里摆酒席，各家都派人来帮忙。可谓“一家办事，全村支持”。只可惜，时代的脚步没能留住这些集体共生的文化，现在庄里人家摆酒席往往都是上大酒店去，过年办年货都是上超市去。年依然是那个年，但味道淡了许多。

一个岛

当两个孩子要上幼儿园的时候，因为心里有个教育的梦，我便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家庭，合办了一个家长互助式的家庭幼儿园，选址在广州的另一个乡郊——长洲岛。当时吸引我的是这里的地貌，它是一个小岛，还有频密的渡轮连接岛上居民出行广州。同时，它还保留有大片的果园菜地，河涌交织，基田相错。岭南的田基是一行田基一行水道，水道与周边河涌相连，如果田基上种的是杨桃就

称为“杨桃基”，种荔枝就称为“荔枝基”，儿歌就有唱“点虫虫，虫虫飞，飞到荔枝基”。从小到大，头脑中的岭南水乡就长这个样子，于是，我们毫不迟疑定居在此，过起出门有街坊，天天能趁墟的日子。

岛上有早市和墟日，不少本地阿姨卖自家种的菜；岛上也有自己的宗族、庙宇。最隆重的节日是端午节，在真正的水乡自然会有龙舟。村里保存了很多岭南过端午的习俗，如提前一个月，乡老就敲锣鼓穿街过巷为端午募集捐款；在约定的日子，就会在河涌起龙舟；初一到初五划龙舟出海到其他村落探亲；端午前后在祠堂免费派龙舟饭，寓意乐善好施，老少同乐。不得不提的是，村里还存了一只有着180年历史的老龙头，每每提到，70多岁的族长总是娓娓道来，他爷爷怎样把龙头传给他爸爸，他爸又是怎样把龙头传到他手上的。我们这些外地人，装着本村人的样子认真地凑热闹，还办起端午亲子故事会，让非本地的朋友也能体味到这浓浓的水乡文化。

现在想来，除了端午节，我最想念的是在长洲岛每天和宝贝们一起走绿道下田的时光。我们还编了一段顺口溜：“手拉手，慢慢走，下到田里找蝌蚪！”就这样，无论风雨，我们慢慢地在荔枝树、龙眼树、杨桃树和香蕉树下经过；在鱼塘旁、河涌边逛过；在悠闲的鸡群中嬉笑跑过；在吠叫的看门狗前无声溜过。看着荔枝四月花开，五月挂果，七月成熟，我们总是满心欢喜。阿姨大叔忙着收获的时候，只要大声打个招呼，一束果子就会惊喜地掉到手上。鲜红娇嫩的外壳，晶莹剔透的果肉，是一年中最好的美味！然而，近年来，我们也体会到气候的极端化，有过连绵数周的阴雨，或是连日的暴晒，还飘过雪。植物来不及应对，人也屡屡感觉不适应。或许因为离自然近了，亲身经历了人与自然之间这份深刻的相互关联，我时常惊叹，在同一个地方你也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世界。因为，时间就在自然中，以植物的多姿，以四季的轮换，以气候的无常，诉说着最绚烂最深刻的生活意义。一花一木一世界，万事万物自天成。

在做家庭园的几年，我和周娅办起了三粒豆亲子工作室，旨在推动城市的可持续生活，希望美好的生活有自然的参与，有社群的参与，人能谦卑简朴地生活，从一点一滴做起。慢慢地，我们聚拢了一帮志同道合的伙伴，定期举办各种故事会，生活探索计划，工作坊、游学、分享会，或纯粹的“吹水会”，每个周末都排得满满的。互相倾听、分享、支持的氛围令这个社群越来越温暖，以致让我一直有个渴望，如果我们可以住在一起该多好！

就在这丰盛的四年里，本土文化、大自然、食物及可持续生活

的理念，如埋藏在我内心的种子，慢慢苏醒过来。我隐约觉得，它们或许可以交错地在同一个地方同一群人身上产生共鸣。即便在巨大的城市，还是有那么一个角落让我们可以安放理想。



我的生活空间不再是房子的四面墙，而是有时间跨度、有空间纬度的小宇宙。这种感觉，如同人站在满天繁星的夜空下，突然惊觉自己与天地为一体，宇宙在演绎着雄伟的篇章，而我也是这部史诗中的一个章节。

从一条约到一个庄再到一座岛，看着都是些平白无奇的生活日常。但恰恰是这些琐碎日常，让我感受到与一个地方，与大自然，与历史，与祖先，与一群人，无形地连接在一起。我的生活空间不再是房子的四面墙，而是有时间跨度、有空间纬度的小宇宙。这种感觉，如同人站在满天繁星的夜空下，突然惊觉自己与天地为一体，宇宙在演绎着雄伟的篇章，而我也是这部史诗中的一个章节。

最近两年，我和两个宝来到了德国读书。我这个老广州，顿时觉得过节没了气氛，聚会没了对象，学习换了模式，不由地热切想回家。无奈只能安慰自己，这段新旅程或许正如此文，让我有机会跳出自己的位置，回看过去，辨别出什么对我而言是重要的，我想要一个怎样的未来，而现在还要为未来，准备些什么。

■ 甘宁 曾任广州灯塔计划青少年促进会秘书长，参与创办三粒豆亲子工作室和推动家长互助式教育的豆丁生活园。现与两个孩子在德国斯图加特自由学院读书和生活。

大理上关， 正在改变 的生活

文 | 缪芸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蓝天白云，日出日落，霞光满天，这是外来人眼里，大理的洱海所代表的诗和远方。而对于洱海边的村民来说，这个地方承载着他们正在改变的生活。

上关村地处大理市喜洲镇北端。一侧看苍山，一侧近洱海，半农半渔曾是这里主要的生计方式。近些年来，自然环境在变化，社会在变化，经济在变化，生活在变化，传统文化也在变化。对于个体生活及村庄未来的探索，每个人有自己的理解及应对。个体需求的多样性，社区内部的丰富性和不同质性，或许将给村庄发展带来不同的可能性。

渔业的变化

穿过窄窄的巷子，拐了几道弯，我和朋友来到上关村北登甲本主庙。正在筹建的社区展览室就在里面。

那是村里的老年活动中心，院子的一侧是本主庙。筹建中的展览室在另一栋楼的二层。

上次来是下午，楼下一群老爷爷在打麻将，自有热腾腾的生活之气。

这次来是早上，院子只有赵圭铭和王清两位特意等我们的老人。

三个月前我们来的时候，房间里摆放着村民自愿捐赠的物品，有渔网、背篓等各种生产、生活用品，略显杂乱地堆放着，有待进一步的归类和整理。这一次来，全部物品都进行了归类，每件上都写着物品的名字和捐赠者的姓名。

村民整理的文字材料里记录了捐赠者的信息。

1. 赵圭铭，于2018年7月19日捐赠：手撒网1张、沙窗箩2个、



记录很简单。但每一件物品背后都有其故事，都曾陪伴过主人，见证过风雨。

三层鲫鱼网 1 张、尼龙丝大渔网 2 张、单层大渔网 3 张、三层丙丙鱼也叫非洲渔网 1 张、小麻鱼也叫小满渔网 1 张、手搬木桨 1 根；11 月 22 日捐赠：大杆称 1 套和算盘 1 架。

2. 王清，于 2018 年 8 月 1 日捐赠：铅把 2 块、篾针 3 个、篾箩 1 个、小称 1 杆、秋木浮漂 10 个、烧箕 1 个、尼龙丝和棉沙线各 1 板、篾制养鱼箩 1 个、织网模板大中小共 17 块、倒须笼 1 个、鲫鱼网 1 张、打鱼笼 1 个、海中稳船石 1 块。

.....

一共有 36 户人家合计捐赠了 168 件物品。

记录很简单。但每一件物品背后都有其故事，都曾陪伴过主人，见证过风雨。现在就静静地躺在那里——手拉风箱曾是做饭的好帮手，加大火力，提高效率，现在已没人使用。大渔船用的浮漂，曾经见证村民集体捕鱼的劳作场面。

为了保护洱海，自 1995 年起，洱海开始每年一定时段封湖禁渔。自 2017 年起，洱海实行全年封湖禁渔。菜市场卖鱼档都相当谨慎，不会说自己卖洱海的鱼。

如今，那些与打渔有关的物品的去处，只有博物馆了。同去的朋友说，那么长时间没有用，主人却没有扔掉这些物件，一定是有感情的。

村民整理资料时有写到渔业相关的变化：

打渔的船，从木头船（独木船）到小中大木板船、铁皮船、各种各样的旅游船。渔网，从蚕丝网至麻线网、尼龙丝网、银渔网等。

洱海曾有 12 个品种的鱼：弓鱼、鳊鱼、老头鱼、春鱼、细鲤鱼、春鲤鱼、夏鲤鱼、灰白色鲤鱼、油鱼、大嘴巴鱼、厚唇鲤鱼、鲫鱼。新增草鱼、青鱼、武昌鱼、蛇鱼、非洲鱼、小满鱼、十勾嘴鱼、银鱼、西太弓鱼。

在展览室门口，赵圭铭和王清与我们聊着跟打渔有关的故事。

这是两位普通的老人。坐在村子的某棵树下，或是在巷道里擦肩而过，大概不会给人留下特别的印象。而一些知识，一些记忆，就在春天的日光里，缓缓地翻涌出来。

老人说，以前的技术不先进，没有机械化，织网要靠手工。织网的线是丝线或是麻线，材质容易腐烂，得用猪血、牛血浸泡，并反复地蒸，起到防腐的作用。尽管如此，花 20 天织的网，也只能用两个月。

基于日常的观察，大家会发现洱海的生态有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引进外地的其他鱼种，影响了本地鱼的生长。现在新品种的虾，头上有大夹子，会吃鱼。以前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现在是虾吃鱼。

面对自然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变化，两位老人谈及展览室的两个目的。

这是对下一代的教育：“现在的日子好过了，年轻人吃喝玩乐，打麻将。要让他们了解老一辈是怎么生活的，忆苦思甜。”他们感叹。

“还有就是弘扬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他们进一步升华和总结。

前一个理由，能感受到是他们切身的体会，觉得有重要性和必要性，后一个理由，表述比较笼统，不知是不是受到了政策宣传或是项目的影响。大家都重视传统文化的价值，但如何做，仍在摸索之中。

旅游发展的想象

对于筹备展览室，赵学奎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动员村民把不用的

物品捐赠出来。

社区展览室兼具历史传承、文化教育等功能。从社区展览室介绍文字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赵学奎对旅游发展的想象，及与主流话语体系的对接。“文化引领旅游，旅游促进传统文化创新，二者相辅相承，促进全面发展，全面进步！”从日常交往中则看得出，以展览室为基础，他个人对于发展上关村旅游的预期。

赵学奎今年 62 岁，是一个很活络，做事目的性很强的人。

我和他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上关村，一次是在大理古城举办的摄影展。

他住在下关镇，离上关村有 40 多公里。第一次见面，他特意赶过来，侃侃而谈已经消失了的江村渔火的场景。洱海上游的海面窄得如江一样，周围的各村都有打渔的人家。晚间渔船上的灯火在湖光里摇曳，星星点点洒满湖面。

我问到渔船上的灯。以前的煤油灯已经不用了，一起聊天的年轻女孩拿出一盏现在用的可以充电的灯。



大理的“风花雪月”，说的是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徐霞客曾在游记中写道：“其花黄如钗，大如莲，花开香闻甚远，土人谓之十里香。”

赵学奎和我们说起上关花。大理的“风花雪月”，说的是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徐霞客曾在游记中写道：“其花黄如钗，大如莲，花开香闻甚远，土人谓之十里香。”上关花的神奇之处在于，平年有十二瓣，而遇到有闰月的年份就会开十三瓣。那株花，现在也没有了。

赵学奎说得很激扬，声情并茂的。他并没有太多缅怀的感伤，仿佛走出院子，走到村头，那些场景就能见到似的。他想把美好的东西展现出来，也把骄傲展现出来。而说到的这些场景，是发展旅游的文化资本。

三个月后，我们第二次去展览室。赵学奎电话里说，因为在下关镇接送孙子上学，就不来见我们了。一再客客气气地表示歉意。

他安排了赵圭铭和王清带我们看展览室，并要张罗我们的午饭。因为要到老年协会张会长家吃饭，所以我们谢绝了。到了展览室后，他又通过视频和我们打招呼，并打电话问张会长要不要去展览室见我们，傍晚还发来微信询问今天的行程怎么样。

这样周到的考虑，能感觉出他急切想推动展览室的进程，想看到进展，看到结果。

我对赵学奎的个人情况不了解，听赵圭铭和王清说，赵学奎是在做公益，参与展览室的事，并没有任何收入，只要求一个奖状作为鼓励。

联系到上关村的变迁，特别是生计的改变，及大理古城与周边发展的背景，不难理解赵学奎的急切。

半农半渔曾是上关村主要的生产方式。因为保护洱海的原因，打鱼被禁止了。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上关村曾发展过旅游业，有鱼鹰表演，村民可以带游客到洱海划船。现在，载客的船只能开到附近的湖里，不能进洱海，为此，上关村的旅游业也就萧条了。

除了渔业，农业也发生了改变。曾在苍山上的一间茶室喝茶，远眺洱海。朋友说，之前洱海边是大片绿色的田地，而现在却是越来越多的房子，越来越少的绿地。上关村的田地前些年种大蒜，经济效益好。但大蒜种植需要大量的农药化肥，土地板结严重，对洱海造成污染。为了整治洱海，政府已经禁止洱海边的村子种大蒜。村里的地，有的村民种上自家吃的菜，有的租给外人种花，有的就空着，或免费

给村里的其他人种。

村里人对土地仍然保持着朴素的感情。大家会说，“人离不开土地，土地养活人……租出去可以，但不能改变性质。土地就是土地，就要种植，不能搞房地产……外来人多了，会带来很多事情”。

现在的上关村村民，有的在村附近做生意，有的在大理古城打工。比起周围以古镇为特色的喜洲，以扎染为特色的周城，及更远一些，以洱海湖景为标志的双廊，上关村还在默默地寻找发展旅游的落脚点。

新家谱的意义

比起赵学奎的急切与务实，老年协会的张会长更关注传统文化在精神道德方面的向内作用。

张会长人长得瘦，说话、做事慢条斯理的。

家中院落的一角是他日常工作的地方，不乏高原阳光的猛烈直射。

桌子上堆放着书籍和文稿。张会长不用电脑，写东西都是手写在信笺纸上。信笺是有红色抬头的那种，上面的笔迹工工整整。

从小就生活在上关，他对村子的感情，饱含儿时的记忆。

他说起小学时候湖边的情景。那时候，经济不富裕，有时两个小孩子穿一双鞋。去湖边玩的时候，老师交代不能游泳。有个同学，个子特别高，没有听老师的话，偷偷地跑去游泳，被水草缠住了。

“后来呢？没出什么危险的事吧？”

“他大声地呼救，附近渔船听到就把他救了上来。”张会长简简单单地叙述着，没有刻意渲染情绪。他今年 69 岁，听他讲那时候的场景，像是在翻看一张有些模糊的旧照片。

见过张会长好几次，他说得最多的是家谱和传统文化调查两个

村里人对土地仍然保持着朴素的感情。大家会说，“人离不开土地，土地养活人……租出去可以，但不能改变性质。土地就是土地，就要种植，不能搞房地产……外来人多了，会带来很多事情”。

有的人家没有什么名人，但对家里母亲、奶奶很有感情，记得她们勤劳、朴实、节俭等美好的品质，感念她们含辛茹苦持家糊口，希望带着情感和记忆把这些女性记录下来。

项目。张会长说，原有的家谱，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掉了。这几年通过家谱项目，把口述的、凌乱的信息落实到文字，并将血缘关系搞清楚。这些事，做起来就知道为什么要写家谱了。他的记录扩展了家谱的外延，包含了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传统的耕作方式，村里的祭祀活动，等等。他说，这是现代的家谱，与传统的家谱不一样。以前的家谱主要记录男性，而他在家谱里也记录女性。以前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光宗耀祖，而他更希望通过这些家谱的记录追寻文化的根，也是作为对后代的道德教育。张会长强调道德，是担心“经济上去了，道德下滑了”。他会提到“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耻勇”这样的一些说法。还说，在办丧事的时候，要想想逝去的人在我们思想上留下什么。

上关村有十九个姓氏，因此有十九本家谱。在记录的过程中，村民也曾有过很多讨论，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值得记录，是不是记录女性，等等。各家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家出人才，希望多记录一些值得自豪的事；有的人家没有什么名人，但对家里母亲、奶奶很有感情，记得她们勤劳、朴实、节俭等美好的品质，感念她们含辛茹苦持家糊口，希望带着情感和记忆把这些女性记录下来。

在张会长身上，可以看到老派文人的风范。

他以前是小学校长，身上散发着教书育人的使命感。



作为老年协会会长，他觉得协会有义务做一些传统文化的收集与梳理工作。这是又一层的责任感。

多年来参与到各种项目当中，也培养了他的“项目思维”。他会对照着项目书，一步一步地把事情做好。说起社区展览室，他觉得现在主要工作是要把调查做好。上次开会的时候说到下一步的规划，鼓励年轻人多参与，在村里组织五好家庭等一些评选，在精神鼓励的同时，也有物质奖励。这一次见到张会长时，他已经把奖状词写好了。

与张会长聊起地方感，他的理解是，我是这个地方的人，大家在一起生活。

与很多村子的空心化及原子化不同，因为旅游业的发展，上关村的村民很少在外打工，即使出去相隔也不远，大部分村民都是留在村子里。女儿嫁出去后，张会长与他儿子一家，住在一个院子里。

这些因素会让张会长在做事时，更多考虑日常生活中增强大家在一起的凝聚力，从群体层面来考虑道德感的维系与重建。

在他看来，即使没有外来项目的支持，很多事协会也会做。从他的谈话里，能感觉到他与项目正在做的事之契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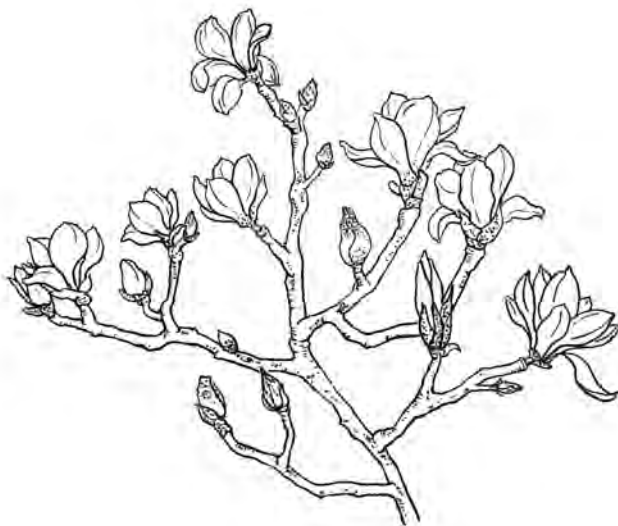
土话的味道

在张会长家吃午饭的时候，聊起了2019年初的戏剧活动。活动邀请本地村里的小学生，以戏剧的方式来讲述本地的传说故事，让孩子更好地了解传统文化。

这是一个为期十天的活动，刚开始我有些担心，天性活泼好动的孩子能不能坚持下来。

第一天活动的间隙，我和几个小女孩聊天。

“喜欢上关村吗？”



“我喜欢昆明。”

“为什么喜欢昆明？”

一个女孩说：“买东西方便。”另一个女孩补充说：“我最喜欢去昆百大（昆明百货大楼）。”

虽然为城市生活所吸引，但家乡的影响和印记，还是不时会闪现出来。

活动的负责人剑飞挑选了几个备选的传说故事，由孩子自己撰写台词。

其中一个为上关花的故事。

大家聊起了传说中的那株上关花被砍的不同版本。一个女孩说，看的人多了，当地人觉得来的人多了会打扰自己的生活，所以砍了。另一个女孩说，官方把树围起来，只让官老爷看，不让老百姓看，所以老百姓把树砍了。她加了一句：“这是一种反抗。”想必大多数的说法都是孩子们从爷爷奶奶辈那里听来的。

排演的另一个故事里有讲到男主人公向邻居请教如何种地，孩子们就回去采访自己的家人。

拟了故事线，小孩子自己写台词。三五人一组，一边用方言操练着现编的台词，一边在纸上记下来。不时因为自己的发挥而得意，笑得前仰后合的。

编好故事，写好台词，孩子们就开始确定演员，制作服装和道具。

导演、统筹、道具管理等职务都是由孩子们担任的。担任导演的男孩带领大家排戏，不时会说“再来一遍”，行使他作为导演的权威。

十天的时间，孩子们都坚持下来了。最初有七个孩子，后来路过排练场地看热闹的小孩子也加入进来，参加的小朋友又邀约其他的小伙伴，最终一共十一个孩子参加了演出。

“放手让孩子们去做”，这是剑飞最大的感受。

“那样土味的话很地道。”张会长对方言创作很满意。剑飞在活动过程中会把孩子们讨论后写在纸上的台词整理、打印出来，方便排练，并保留了孩子们口语化的语言。张会长再用铅笔在上面把一些方言用普通话标注出来。活动结束后，他仍然收藏着那些稿子，拿出来给我们看，甚感欣慰和自豪。

“现在他们只是感受到好玩，到一定时候，六七十岁，就不仅是好玩了。”这是张会长的感慨，也是他的期待。

如何润物细无声地把对地方的情感 and 责任感，播撒在孩子们的心田里，是一个挑战。

放在中国乡村发展的历史脉络上看，上关村不甚特别，却也是一个当下乡村的缩影。一个小村子，在自然、经济、社会、国家政策的影响下，不断发生变化。每个个体都以自己的方式在回应，而村庄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又与每个人紧密相连。每个人的理解和行动，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出于对文化、经济、生活等各方面的考虑，扎根于日常生活之中。传统文化的价值是对外的展示，也是对内的认知与实践。而它的意义不仅是传承，更是不断地反思与创新，重新寻找其对当下生活的意义。在变化中，寻找个体的走向，也寻找村庄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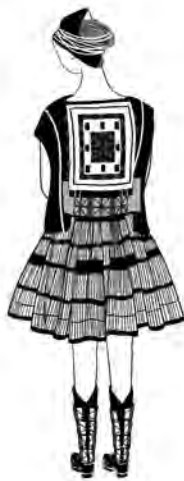
一个小村子，在自然、经济、社会、国家政策的影响下，不断发生变化。每个个体都以自己的方式在回应，而村庄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又与每个人紧密相连。

■ 缪芸 毕业于伦敦大学人类学专业。曾任记者、图书撰稿人，现入职大理大学，涉猎人类学众多领域。长期关注社区发展，曾参与多家非政府组织的调研与培训项目。

奈何制衣

白裤瑶服饰 制作的地方性 文化动因

文 | 汪斌



2015年，我供职的机构云南乡村之眼乡土文化研究中心¹开始在广西南丹县里湖瑶族乡开展项目。是年8月，“乡村之眼”联合台湾学者造访里湖乡，我们一行十三人，与当地的乡村影像伙伴一起开展影像交流工作坊。期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一位志愿者不小心丢失了T恤衫，急需临时买一件，可是找遍整个集镇，只发现一家所谓的服装店，还是以售卖鞋子为主，零星搭配一点服装，根本没法挑选……我们这才明白，里湖乡以白裤瑶族为主，至今依然盛行就地取材、手工制作本民族服饰，对外来便装的需求量相对有限。而后，对白裤瑶村民影像小组多年来累积的乡村影像作品稍作统计也发现，半数以上作品都与服饰制作紧密相关，足见服饰制作在现今白裤瑶生活中的重要性。

手工制作服饰是极为费时耗力的，何况还要依时令季节就地取材。在现代化与市场经济大浪潮的冲击下，很多地方的民族服饰，手工工序趋向于机器制作，原材料主要依靠市场购买，或者只保留一些纹饰刺绣传统工艺，甚至已经完全依靠市场购买全套成型的民族服饰。那么，为什么当今社会的白裤瑶不顾时间和经济成本，一直坚守着就地取材的家庭手工服饰制作模式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在协调跟进“乡村之眼”在广西白裤瑶区域的项目的同时，也开始了以服饰制作工艺为切入点的人类学田野调查。2016年相对集中地在寨子里待了六个多月，参与观察不同季节的服饰制作工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一步步走进白裤瑶的服饰世界，也尝试一点点探究“奈何制衣”的地方性逻辑与观念。

依时制衣：服饰制作中的自然之道

白裤瑶是我国瑶族的一个分支族群，自称“多努”或“朵努”（瑶语音译，意为“白裤瑶的子孙后代”），外界称为“白裤瑶”（因男子常年穿及膝的白色土布灯笼裤）。历史上，白裤瑶常迁徙，大概在宋朝时期来到桂西北与黔南交界的亚热带喀斯特岩溶石山区，而后世代定居在这里²。“七分石山，二分旱地，一分田”是形容当地地形地貌特征的俗语，白裤瑶是典型的山地民族，广西南丹里湖瑶族乡算是其聚居腹地。

2016年3月至4月，我开始了第一次比较长时段的田野调查，由此明白了白裤瑶因为制作服饰与这一地区的气候和自然建立起的微妙互动关系。

初到时，整个里湖笼罩在“回南天”的绵绵春雨与浓浓雾气之中，天气比较寒冷，在白裤瑶寨子里，仍然是画粘膏画和蓝靛深染的季节，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粘膏味³。然而，相比干冷的冬日，“回南天”的春雨与大雾是各类植物抽枝发芽的恩赐，山林间众多用于服饰助染定色的植物，房前屋后用于喂养蚕宝宝的主食桑叶被悄然滋润。待到清明节前后，春雨渐弱，云雾渐散，白裤瑶村寨的粘膏味慢慢退去，代之以各种野生植物的清香气味。也就是说，天气转暖，画粘膏画、做蓝靛深染的季节慢慢过去，到了野生植物助染、蓝靛浅染、野生植物定色，以及呵护蚕宝宝、守候蚕丝布的时候了！

长期生活于此的人们练就了根据云雾走向判断天晴或下雨的本领。初春时节，选定一个放晴的好天气，三五结伴到山上摘回一捆捆鸡血藤嫩枝，准备助染裙子、背心、背带、天堂背心、天堂被等画有粘膏画的物件。视助染物件的多少，每轮选择几捆用锤子锤碎，再用布或者丝网口袋包住，加入适量的水，挤压滤出血红的汁液，放入助染物件，快速浸染几十秒后，取出晾晒。大概两小时晾干，而后再锤再染第二轮，如此反复，一天可染七八次，一整个冬天的劳动成果自此焕然一新！我游走村寨，上山林、下田地，看人们干活，也参与帮忙，嗅着捶打鸡血藤嫩枝和熬煮薯蓣⁴散发出的清香气味，听人们分享今年的鸡血藤长势如何，哪里的薯蓣又大又红……享受着属于白裤瑶寨子的春天气息！

可是，大自然给予的从来不只是恩赐，与春雨相伴的还有雷电和冰雹。

1. 云南乡村之眼乡土文化研究中心是中国西部乡村影像培训与研究机构，与村民、牧民伙伴合作，以影像工具为媒介，把纪录片的拍摄剪辑放映过程变成本地人之间、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青年人与中老年人之间互相交流沟通和学习的过程。

2. 南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丹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7页。

3. 白裤瑶服饰制作主要依靠浆染工艺，凿取本地种植的一种俗称“粘膏树”（学名“刺栲”）的椴树科植物的汁液，用画刀绘于棉布上，将画好图的棉布置于蓝靛染料中浸染，粘膏作为“防染剂”，布面上便有了花纹。寒冷的冬季和初春季节，是画粘膏画和蓝靛深染季节，温火溶化粘膏而散发出特有味道，是白裤瑶寨子这一季节的嗅觉标志。

4. 助染服饰的植物主要有鸡血藤和薯蓣块茎两种，一说薯蓣对粘膏有伤害，所以人们多用鸡血藤助染带粘膏画的物件，用薯蓣助染棉布。

老人家说，大年初一星星太好，预示着今年会有雷雨冰雹天。
果然……
大粒大粒的冰雹砸向房顶，敲击玻璃，撕碎树叶……
狂风乱作，大雨倾盆。
雨水顺着窗缝，顺着门缝，渗进楼梯，渗进房间，
渗到装满服饰的木箱下，渗到装满粮食的口袋下……
电是早就停了的……
孩子是被吓哭了的……
蚕宝宝的头是很痛的……
哄小孩，开手电，垫木箱，堆粮食，扫积水……
男人出门打工了，忙坏了三个女人！
这还是楼房啊，那么，泥瓦房子的人家呢？！
唏嘘不已……唏嘘不已……
冰雹渐停，大雨依然倾盆下，积水扫也扫不完。
那就不扫了吧，给山外找钱的人打个电话，倾诉！

以上是我于2016年4月3日晚在白裤瑶寨子遭遇冰雹天气时记的一段田野日志。不仅4月3日，还有4月17日，接连两场大冰雹，直接把白裤瑶朋友们的泥瓦房砸得千疮百孔，房瓦翻修再翻修，耗心耗力，大家自嘲说：“也算是住上了抬头见星空的豪宅。”

房瓦损耗了尚可翻修，雷雨冰雹天气对蚕宝宝而言却是生死攸关的考验。白裤瑶喂养的蚕属本地蚕种，被唤作“朵娃”（瑶语音译，与两岁以下小孩同称谓）。在白裤瑶古歌里有“娘胎倒别”的唱词，认为蚕如自己的儿女般来自娘胎，需要精心呵护。依照这样的逻辑，他们将蚕吐丝前的三次不食不眠现象称作“睡觉”，将蚕吐丝称作“回家”。大概在农历三月上中旬，蚕宝宝第三次“睡觉”醒来，进食桑叶四五天后就准备“回家”了。这段时间，对白裤瑶妇女至关重要，第三次睡醒的蚕宝宝数量直接决定了该年蚕丝布的收获情况。农历三月，是白裤瑶聚居地区雷雨冰雹天气的多发月份，而蚕宝宝听见雷声就会“头痛得厉害”“身体变成浓浓的黄色”“皮开始起皱”“身体缩短”“病怏怏的”……这是它们的一大劫数，有些蚕宝宝可能会在第三次“睡觉”时沉睡不醒，不仅使得前面的精力全白费，更让人伤心的是，这一年再也没办法收获精美蚕丝布了！

手工的白裤瑶服饰依时令季节就地取材而制，大大小小三十多道工序环环相扣，首先需要与不同季节的气候环境背景相调适，亦讲究与多种多样的原材料，与住屋环境卫生条件，与制作者的心性，以及与其他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相调适的经验和知识。

田野调查时，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变动不定的各方面因素随时影响着工序繁杂的服饰制作进程，以至于对白裤瑶妇女来说，有关服饰制作的很多东西似乎都是“活的”，要看自己的手与每道工序是否有缘，是否相合，她们用汉话“手气”一词来意译那些充满运气与灵气的诸种“活的”东西。除了马上要“回家”的蚕宝宝遇到雷雨天或病或死，由此没法获得足够多、足够好的蚕丝布会被认为是“手气不好”之外，蓝靛染料中途出现故障而使得棉布染色效果不理想，染色时粘膏脱落而使得整幅图被毁，织布时纱线容易断开，跑纱不太顺利，等等，都被认为是“手气不好”的体现。

可是，也正因为“手气”现象的存在，才使得服饰制作对于白裤瑶来说弥足珍贵，应对“手气”的过程，也正是他们与自然产生深厚联结，积累各种地方性经验智慧的过程。比如，初春织布最不容易出现“手气”现象，因为“回南天”阴雨绵绵，空气湿润，棉线结实不易断，织布效率最高，布匹最好。再比如，蚕宝宝的主食桑叶至少存在四个好坏不一的品种，不同品种的生长环境不同，食用“口感”亦不同，蚕宝宝养护中的“手气”就涉及对各种桑叶“口感”特征、生长情况的综合调配经验。

可是，也正因为“手气”现象的存在，才使得服饰制作对于白裤瑶来说弥足珍贵，应对“手气”的过程，也正是他们与自然产生深厚联结，积累各种地方性经验智慧的过程。



互助制衣：服饰制作中的处世规约

透过服饰制作，敏锐感知气候，熟识山林习性，这些正是一个山地民族的地方性经验和智慧所在。可是，“手气”现象的存在只能说明白裤瑶服饰制作的不易，并不能解答我最开始的疑问，为什么当下依然选择手工制作服饰，甚至制作得更为讲究？2016年11月中旬，我第三次来到白裤瑶好朋友小兰家常住，参与观察服饰靛染时节白裤瑶村寨的生活，开始了解“手气”背后的“人气”，了解白裤瑶因为制作服饰而特有的人情味和社会文化氛围。

一日，我随小兰去走亲戚，而后顺着田埂步行回家，闲聊途中，她突然问起我对于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梦想。有感于那段时间听她讲了很多白裤瑶母亲如何带着女儿一起做服饰、如何照顾女儿的种种——这些“女儿”与我年龄相仿，离乡漂泊十来年的游子遂有感而发答曰：“我啊，希望尽早赚钱把自己安定下来吧，再让我妈来照顾我……”话音未落，小兰已在旁边惊呼：“啊，竟然是要你妈照顾你，怎么不是你照顾你妈？！”反应之快，语气之惊，的确把我问住了！惭愧之余，也让我对于白裤瑶服饰制作背后的意义和原因有了更进一步的感知……

白裤瑶女孩学习服饰制作，往往从裙边绣开始学起。我一开始不了解其中缘由，直到自己亲手尝试之后才明白，裙边绣采用挑绣工艺，在特定宽度的两条经线之间，按照一定规律来回挑起纬线，构成一个大菱形套住多个小菱形的图案，这是服饰制作最基础的工序。学会裙边绣就等于学会识别棉布的经纬线，这是随后学习画粘膏画、刺绣、织布等其他工序的基础能力。一环套一环的白裤瑶服饰，其制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蕴含着白裤瑶先辈们积累下来的丰富的地方性经验知识，通常需要制作者学习实践若干年，才能够把握实际操作中的各种智慧和讲究。

“外婆—母亲—自己、姐妹”是白裤瑶最普遍的服饰制作家庭互助小团体单位。因为服饰制作小团体的存在，服饰制作中出现的“手气”挑战由大家一起来面对，可大大降低服饰制作的“风险”比例。也因为服饰制作，这个小团体成员之间有许多沟通交流的机会——互相帮助、互相分担、互相体谅——也有了联结情谊的重要媒介。

初为人母的年轻女性往往也只会一些简单的基础性工序，更多



在邻里互助制作服饰的过程中，考验的是白裤瑶妇女为人处世的能力。你必须按“规矩”行事，融入互帮互助的氛围中，通力合作，才能把服饰做好，也才能获得自己的“立足之地”。

更复杂的工序还需要进一步学习，而最好的教授人就是自己的母亲和外婆。每个小团体，大概会有一到两名服饰制作主力，到了服饰制作季节，大家便会以主力为中心，分工协作，共同完成多套服饰的制作。随着母亲年纪的增大，女儿积累的服饰制作经验越来越丰富，小团体中的服饰制作主力便会转移，女承母艺，负责重心工序。所以，一个白裤瑶女人，会因为嫁为人妇、成为人母而决心学习服饰制作，也会因为母亲的年老而担起服饰制作主力的重任。当今社会，多少母女还能有这样的沟通相处媒介，多少母女还能这般互相体谅呢？

除了家庭小团体互助模式之外，邻里互助亦是白裤瑶服饰制作的重要补充形式。在邻里互助制作服饰的过程中，考验的是白裤瑶妇女为人处世的能力。你必须按“规矩”行事，融入互帮互助的氛围中，通力合作，才能把服饰做好，也才能获得自己的“立足之地”。大家在转工互助中亦会形成一些公共意识，比如，及时收获庄稼以便大家放养牲畜后腾出时间精力专心制作服饰，一起清理疏通村寨里用于捣衣洗布的水池、河流。

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可是外面的生活未必比家里好过，一些年轻白裤瑶朋友也会感叹：“在外面打工，要么跟着工程队到处跑（工资高、风险大），要么进工厂（工资低、耗时长），都是在出卖劳动力，很辛苦，做烦了也不怎么想出去，宁愿在家里继续过做服饰的生活，其实，做服饰大家互帮互助，那种感觉还是蛮好的……”

穿衣场合：“威要”荣耀是制衣的内在动力

“那种感觉”是指身处服饰制作的互助“规矩”中所感受到的集体“人情味”氛围，与“金钱味”氛围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体验。然而，服饰于白裤瑶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它还关乎“威要”（瑶话音译，意为“家族”或“宗族”，有自己的象征物和仪式活动）之荣耀！

当问及白裤瑶妇女为什么年复一年制作服饰时，会得到如下答案：“必须一直做啊，我们这些服饰三五年就过时了，你不做新的就没得穿。”“过时”与否，是对服饰的审美流行评价观念，与服饰的穿戴展示场合相关。在白裤瑶，服饰最重要的穿戴展示场合为年街节和婚丧仪式。

离农历正月十五最接近的圩日，被视为一年中“最大的圩日”，约定俗成，着盛装，赶年街，唤作“年街节”。年街节于白裤瑶的意义就如同春节之于汉族。2016年初，我第一次参加里湖年街节，被街道两头两个大型停车场的摩托车海震撼，更被占据整个街道、来回行走的人海震撼。

不仅节日当天，节前节后的那几天，整个寨子都会笼罩在亢奋的气氛中，大家会一起讨论关于赶街的所有话题，服饰往往是话题中心。“大家都穿新衣服，你不做新的，别人会说的。”为了这一天，人们甚至会提前好几个月就开始做准备，有条件的都会做新的服饰，没有条件做新的也会通过再次浸染等方法把旧的加工成“新的”。而怎样算“新的”，又是常年在变动的，有流行与过时之别。以服饰染黑效果来说，就常常流行很多不同的黑，比如偏蓝的黑、偏红的黑、偏绿的黑等。这些不同的黑，既和染色材料相关，也和染色次数等相关。“你穿得黑一点，别人就会很羡慕，因为这说明你花

了很多心思和钱在上面……”染黑，意味着有钱买足够多的蓝靛膏，有足够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服饰，是能干和富裕的标志。

这里比较有趣的是：以本族群内部人员为主的年街节场合，服饰穿戴展示给本族人看，穿戴者也是制作者，于是，评价的标准并不仅仅是服饰形制款式的美丑，更与服饰制作投入的时间精力、原材料的质量等息息相关。女人服饰做得好不仅说明她能干，而且说明家里富裕（指家族愿意让女人花钱花时间制作服饰），男人有很好的服饰说明他家有人做服饰，也是很体面的事情。于白裤瑶而言，服饰不仅仅是服饰本身，它代表着妇女及其所属服饰制作小团体的才干，更代表着“威要”的荣耀。

这个道理在白裤瑶的婚丧场合体现得更加明显，这与白裤瑶特定的社会组织体系和文化氛围相关。聚居在桂西北黔南交界石山区的白裤瑶，总人口不及40000，至今依然保持着五个姓氏群，每个姓氏群中再分为若干宗族，宗族之下最小的血缘单位是家庭（瑶话叫做“依则努”），由此，“姓氏群—宗族—家庭”⁵构成了白裤瑶血缘群体的基本框架，是一种自生的社会组织，白裤瑶生产生活的诸方面习俗都是依附于这一基础社会组织结构之上的，互帮互助是其主体文化氛围。加之白裤瑶婚丧年节集中在冬春季节的时段特殊性⁶，与当下的外出打工潮流错开时间，所以可以取得相对的平衡，依然保有比较浓厚的氛围。与这些仪式节庆活动相伴随的，是一个乡土社会的重要社交活动，一整套名望评价体系就在其中。通常情况下，人们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参与这些活动，准备最好最精美的服饰就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对荣耀的追求无形中成为了大家坚持手工制作服饰的压力，需要每个白裤瑶妇女、每个服饰制作小团体、每个家族认真对待。

由是观之，服饰的穿戴展示是奈何制衣的关键，要想维系白裤瑶服饰的家庭手工制作模式，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相处的整套地方性生态智慧，核心在于维系白裤瑶内部自生社会组织结构的稳健力量和互助的社会文化氛围。

女人服饰做得好不仅说明她能干，而且说明家里富裕（指家族愿意让女人花钱花时间制作服饰），男人有很好的服饰说明他家有人做服饰，也是很体面的事情。于白裤瑶而言，服饰不仅仅是服饰本身，它代表着妇女及其所属服饰制作小团体的才干，更代表着“威要”的荣耀。

5. 参见云南社会科学院郭净老师《寄语白裤瑶乡村影像小组》（2016年“白裤瑶乡村影像展”的影展手册前言）。

6. 白裤瑶实行“二次葬”俗，对此习俗的一种解释是，“七分石山、两分地、一分田”的生存环境，使得白裤瑶的物质条件有限，若人在四至九月间过世的话，粮食还生长在田地中，存粮有限，不够招待亲朋，所以要先浅葬，等到秋收后，再为逝者举行隆重的丧葬仪式。婚嫁与此同因。

■ 汪斌 民族学硕士，2015年加入云南乡村之眼乡土文化研究中心（简称“乡村之眼”），主要负责广西南丹白裤瑶区域的项目协调工作，长期陪伴“白裤瑶村民影像小组”成长。

最好的时光
都放在
这里了

北京回龙观
“幸福树”下
的阅读生活¹

文 | 霍伟亚

2018年感恩节前，重读绘本《妈妈的红沙发》²，联想起前些天的搬家场景，点点妈不禁又掉了眼泪。点点妈是北京回龙观幸福树童书馆的发起人，运营幸福树5年多了。

感恩节前的10月15日，迎来了幸福树成立以来的第二次搬家，这次是从一个小区搬到马路斜对面500多米外的另一个小区，和第一次搬家一样，很多会员都参与进来，而且人数更多。城市房租高，实体书馆生存不易，让点点妈放下疑虑继续运营的，正是这些会员们一如既往的无私帮助。

搬家

正式搬家的日子，早上不到9点，点点妈已经到了书馆准备打包收拾。还没坐稳，就看见美钻的爷爷奶奶一前一后走进来：“哎呀，还没有吃完饭，你叔叔就催我，快点，别收拾了，要不该迟到了。”奶奶话音刚落，爷爷不好意思地回了一句：“哪有啊？”

古稀之年的爷爷奶奶跟大家一道帮忙把书一车车运到新馆。在新馆，爷爷笑着对点点妈说：“姑娘，别管这边了，你就去当总指挥，这些活儿交给我们就行啦。”因为新馆卫生欠佳，奶奶把书搬进去后，又撸起袖子把屋前屋后清扫了一遍。

在奶奶打扫卫生时，幸福树的会员们自带小推车陆续赶来，搬书、打包、整理、分类、装箱……

因遭遇过家庭经济困境，以前读《妈妈的红沙发》时，点点妈总会被书中一家人的积极向上激励，但这次却被书中的一个场景感动——

绘本里有一家三口，外婆、妈妈和孩子，妈妈在餐馆工作，每天辛苦劳动。一家人计划攒钱买个红色沙发，给妈妈休息用。但不幸遭遇了一场横祸，家里发生火灾，东西都被烧光了。她们先借住在亲戚家，然后重新装修自己的家，装修好了，屋子里还是空空荡荡的。



“搬新家那天，邻居们带来比萨、冰淇淋和好多东西。对面的邻居搬来一张桌子和三张椅子。隔壁的老先生给我们一张床，是他孩子小时候睡的。爷爷拿来一块美丽的地毯，小姨为我们做了一组红白条纹的窗帘，乔阿姨带来锅碗瓢盆和刀叉，表妹把她的玩具送给我。外婆对大家说：‘你们是世界上最好心的人，真的很感谢你们。幸好我们还年轻，可以从头开始。’大家热烈鼓掌。”

这场景勾起了点点妈的搬家记忆，“每想到那一刻，我就忍不住泪流满面”。

天天妈中午在单位，中途请假跑出来；土卫妈从人大下课没吃饭就过来；马克妈带着亲戚表弟开车一块儿来助力；顾厂长带着员工和嫂子开着大车将所有大件挪到新馆；美钻爷爷给大家买矿泉水，解决了我的疏忽；小语奶奶为了不让我多花一分钱，把家里的五金零件箱都抱来了。

还有菁菁妈、萌奇妈、璠璠妈、壮壮妈、柱柱妈、成成妈、喜宝妈、nono妈、尼克妈、皮皮妈、石头妈……

感恩节当天，点点妈在公众号上分享搬家当天的情景，随手就罗列了这一长串名字。

1. 本文部分内容引用了公众号“童书妈妈三川玲”2014年7月的文章《幸福树：比黄太吉、马佳佳、雕爷更互联网的点点妈》，以及公众号“幸福树儿童成长馆”2018年11月的文章《幸福树下，感恩遇到你》。

2. 薇拉·威廉斯：《妈妈的红沙发》，柯倩华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幸福树不是点点妈的，幸福树不是一个人的，幸福树是陪着我一直走下去的大家的。”

当天实际来了一百多人，都是生活在回龙观地区的居民，因幸福树童书馆相聚相识。得知书馆搬家，他们志愿来帮忙。有近三万册书、几十个书架的幸福树，一天就完成搬家；第二天这批志愿劳动大军继续行动；第三天，新馆就恢复了正常借阅。

看着两天就恢复运营的书馆，点点妈对自己说：

“幸福树不是点点妈的，幸福树不是一个人的，幸福树是陪着我一直走下去的大家的。”

睡城

幸福树童书馆所在的回龙观是北京北郊一个人口密集的居住区，20年前还是农地，从这里去市中心，坐公交车要在坑洼的黄土路上颠簸一个多小时。1999年，这片土地被北京市政府批准为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规划居住人口30万。如今，34平方公里的地方居住了50多万人，有“亚洲第一大社区”之称。

2000年第一期住房建成以来，居民开始在回龙观聚集，除了市中心拆迁安置来的北京土著之外，还有很多年轻的北漂。这里没有什么就业机会，年轻人需要去市区上班，大多过着早出晚归、职住分离的生活，回龙观也因此落了个“睡城”的称号，名声在外。

我在北京生活了14年，早知道回龙观的存在，但从未真正走进它，更不了解里边的人情冷暖和喜怒哀乐。回龙观于我，只是一个远在北五环外的知名睡城。

回龙观最近一次闯入全国人的视野，是因为一首歌。2016年7月，创作了多首网络神曲的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发表新作《感觉身体被掏空》，歌词讲的是一位北京上班族不得不加班的故事：

这位上班族家住回龙观，但工作地点在东三环外的朝阳公园，每次通勤都是一场“征战”，眼看到了下班时间，却又被老板喊去开会、加班，“感觉身体被掏空”。

不到一周，这首歌的网络点击量达几千万。

为什么家住回龙观的人会“感觉身体被掏空”？城市规划师茅明睿³曾经做过一项对比研究，发现回龙观居民通勤时间比望京——曾是北京的另一个睡城，多出一个小时。



我曾坐地铁体验歌词中描述的这条路线，光是在车上的时间就需要一个小时，这在北京还算常见，但让人揪心的是，早晚高峰时段，进地铁要排很长很长的队。

这首“神曲”再一次加深了回龙观在世人心中的“睡城”印象。虽然 2015 年以来，政府部门开始做各种努力，引入就业机会，想让人们既在这里生活，也在这里工作，企图撕掉“睡城”的标签。

对于回龙观，“睡城”标签有其真实性。但在回龙观走访一周后，我却慢慢感受到这座“睡城”的另一面——温度。

回龙观是一个长方形的区域，第一次进回龙观，我从它的东部

3. 茅明睿，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云平台创新中心秘书长，北京城市实验室联合创始人。近年来专注于基于定量城市研究方法的城市治理实践，利用数据科学支持城市运营、治理和更新。

青年人从这里开始自己的北漂生活，并在这里相识、结婚、生子，守望相助；幸福树正是其中一个联结中枢。在这里，大家彼此可能不知道对方叫什么，但会知道对方的孩子叫什么，于是彼此称呼“某某妈”“某某爸”。

切入，沿回龙观的主干道往里走，主路六车道，车道外修了标准的人行道，人行道外还有一车道的辅路，行道树估计有三米多高，道路两边的建筑不超过六层，一层商铺是各种餐馆。

这景象跟 15 公里以南的北京核心区很不一样，感觉更开阔，当时路上行人、车辆也不多，让人感到一丝安宁，像走在另一座城市。

“这地方设计得很规整，东西南北很清楚，位于北京上风口。为了不影响北京的‘通风’，所以楼都不高，雾霾指数会比市区低一些，像北京一个独立的小系统，让人有安全感。现在的居民主要在附近的互联网公司工作，三四十岁居多，孩子都在幼儿园或小学阶段，很多家庭也在计划要二胎。为什么敢要二胎？可能他们觉得这里的生活水平还是不错的吧。”

一位咖啡馆的工作人员给我介绍她眼中的回龙观。2014 年她住到回龙观，最初只是这家店的顾客，后来就变成了工作人员。她说，生活在这里有归属感，生活便利、人际关系亲密，周末的生活像成都。

和睡城里的店主、居民深入交流后，我发现，新居民在回龙观并不只是睡觉，睡觉之外的生活需求催生了各种人际联结和自助服务。政府公共服务配套没能跟上，新居民被迫养成了自己动手的习惯。围绕踢球、读书、亲子、养狗等生活话题，居民不仅创建网上论坛、微信群，有的还正式注册了社区组织。回龙观的社区网站，注册用户有 60 多万，而全国闻名的社区足球联赛“回超”，已经举办了十多届。

青年人从这里开始自己的北漂生活，并在这里相识、结婚、生子，守望相助；幸福树正是其中一个联结中枢。在这里，大家彼此可能不知道对方叫什么，但会知道对方的孩子叫什么，于是彼此称呼“某某妈”“某某爸”。

点点妈，即点点的妈妈。

玩具店

点点妈是山东人，中专毕业，2003 年初来到北京打拼，第二份

工作的地点位于回龙观南边的西三旗，于是就住到了回龙观，自此成为一位资深的“观里人”——这是生活在回龙观的居民给自己的身份认同。后来，点点妈在这里认识了点点爸，随后成家立业，安顿下来。

有段时间，点点妈在回龙观地区东南角的霍营地铁站摆地摊卖玩具，那时孩子三岁多，点点爸生意失败欠了外债，家庭经济陷入了困难。

但点点妈的玩具生意做得很好。别的玩具摊主一般都卖便宜、市场流行的玩具，点点妈卖的不一樣，她都是从批发市场精心挑选木质玩具来卖，因为更安全。“我卖的玩具只有两种，要么进口的，要么出口的。劣质的玩具我不卖。自己的孩子都不给玩，还在这儿卖，我觉得有点昧良心。”

据童书自媒体“童书妈妈三川玲”2014年的采访，“点点妈的玩具深受欢迎，回头客不断。有时顾客购买她的玩具，需要排队交钱。有时她出摊晚了，一些老顾客就会在老地方眼巴巴地等着她。”后来，回龙观地区知名的新式教育学校日日新、芭学园等都从她这里订货。

独特的经营理念吸引了独特的人群，也吸引了机会。

顾客群里有一位住在回龙观的清华大学教授，和点点妈聊起清华大学有个“‘巾帼圆梦’万名女性创业助学计划”的培训课程，想帮助点点妈申请免学费上课。得益于这样的机缘，点点妈去清华大学上了几周的课程。

我后来才得知，在回龙观的住房开发中，有很多北京高校的老师、企业员工在这里集体购房，使得回龙观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高。2018年10月23日《北京晚报》曾提到一组数据，昌平区“回龙观、天通苑居住的100多万人口中，60%以上拥有大专以上学历，70%左右是45岁以下的青年人群，而且多从事IT、金融、文化设计等工作”。

完成课程之后没多久，点点妈把玩具生意搬到回龙观地区中心位置的综合批发市场——鑫地市场，往来的都是生活在回龙观地区的孩子家长。点点妈是个研究型的人，玩具适合什么孩子玩，都是自己琢磨研究，然后根据孩子的情况给家长推荐适合的玩具。她记人记得特别准，孩子叫什么、几岁了、什么性格，张口就来。因为和顾客关系处得很好，她的摊位也从一个发展到了四个。

于是就住到了回龙观，自此成为一位资深的“观里人”——这是生活在回龙观的居民给自己的身份认同。

那时的点点妈还没有育儿、绘本之类的知识，更不用说童书馆，脑海里还是传统的教育观念，“不听话了就打呀”。

其间，有一件事让她深受触动。

有一位妈妈带孩子路过点点妈的玩具店，孩子看到一个特别喜欢的玩具，一定要买。但他们家有规定，玩具日才能买玩具。“小孩可不是，不给就撒泼打滚，要是我，我可能就提溜起孩子就走了，多丢人呀，要么我就妥协。”

但这位家长就半蹲在玩具店摊位前，一边抱着孩子安抚他，一边很温柔、坚定地拒绝孩子的要求，“不可以”。

“孩子一直在那里哭，我都觉得不好意思，我说，‘要不我送他吧，你也别让孩子难过’。家长说，‘不用不用，我来处理’。她就一直抱着孩子，说，‘我知道你很难过，特别想要……’过程很共情。最后他们商量了一个办法，预付定金，让我把玩具收起来，等下个星期四玩具日到了再取走。”

整个过程持续了近40分钟。点点妈以为这位妈妈是位老师，后来得知不是，她的孩子在芭学园上学——回龙观一家有名的新式学校。

那时的点点妈还没有育儿、绘本之类的知识，更不用说童书馆，脑海里还是传统的教育观念，“不听话了就打呀”。

但这件事还是深深地触动了她。后来，是点点同学的家长改变了她的认知。

点点所在的幼儿园离玩具店不远，因为孩子在同一个幼儿园上学，一些聊得来的家长就常聚在一起。有位学心理学的妈妈特别关注点点妈，给她推荐了几本有关育儿以及亲密关系的书，“她和我谈，‘你的执行力很强，不应该开玩具店’，我也没跟她说家里的状况”。

还有一次，点点妈和女儿去小区的同学家作客，发现同学家里有三个书柜，都是童书，内容也不同于点点看的《三字经》《弟子规》之类。

“我与点点坐在邻居家的地垫上，一下子被上面的精美图案与诙谐的内容吸引了，一边读一边哈哈大笑，最后朋友把那本书送给了我们。回家后，我与点点还一遍遍地读，一次次地演！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绘本。”

那天，点点妈问了这些书的购买地点，第二天就去买了两大箱放到玩具店，谁来买玩具，她就强烈推荐看书。后来书逐渐增多，玩具店的书架从最初的一个增加到两个。有人问能不能拿回家看，点点妈觉得没啥，来买玩具的人素质都挺高，看完肯定会送回来，于是玩具店新增了一项“业务”：借书。

“来的妈妈可能也感觉，这个卖玩具的不太像卖玩具的，他们后来不停地介绍朋友来我这里买玩具，从石景山、通州、大兴跑过来，一拉就是一车，有时一花就是几千块钱。”



童书馆

2013年初，经常去点点妈店里买玩具的一位妈妈说，自己运营的童书馆不想做了，问点点妈是否有兴趣接手。那时，点点已经上小学，放学都是接到鑫地市场里，点点妈觉得嘈杂的氛围不利于孩子成长，童书馆环境更好，孩子可以看书休息，于是就接手了童书馆。

童书馆确实影响了女儿，“现在点点上初一，特别喜欢看书。没有书，报纸、药品说明书也能看半天”。

如果孩子接到玩具店，给孩子的就是纷乱的世界，但到童书馆，至少安安静静，有文化底蕴，就想再开一段时间试试。

最初，童书馆把玩具也放进去，但后来点点妈发现不合适，小孩看到玩具，就不看书了，冲进来就找玩具，最后就把玩具都撤了。

接手后，童书馆不盈利，还不如卖玩具，点点妈知道家里还有外债，但又不忍心关掉童书馆。“如果孩子接到玩具店，给孩子的就是纷乱的世界，但到童书馆，至少安安静静，有文化底蕴，就想再开一段时间试试。”

童书馆的经济收益不如卖玩具，2014年9月，点点妈把玩具店给关了，因为出了一场车祸，没有精力照看。为什么撤的是玩具店而不是童书馆？这和童书馆的会员有很大关系。

交通事故后，点点妈在医院住了三个月，童书馆一天都没有关门，由会员排班轮值管理。

点点妈也几乎没有吃医院的饭，都是邻居、会员轮流送饭。有一位会员叫月亮妈妈，孩子还很小，月亮妈妈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提着饭，来到医院，让点点妈躺在医院病床上泪流满面。

“我出院后就跟老公说，无论如何，童书馆关了真不忍心。所以就熬着，坚持到现在。”

如今幸福树童书馆有四百多个家庭会员，孩子放学以及周末是童书馆的热闹时间，孩子们来了自己读书，馆里的工作人员也会带着孩子们一起读故事。家庭交了年费，随时都可以进来，不按次计费，还可以把书借走，每次六本。

在点点妈心里，幸福树已经成了她的另一个“孩子”。

时光

第一次见点点妈时，我问她，现在回龙观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她说，不是北京人，但又一直住在这里，“最好的时光都放在这里了”。

刚来回龙观时，点点妈就想着，来了就扎在这儿吧，主要考虑工作怎么办，也不会去想“我的生活”是什么样。住了十几年，回龙观现在成了生命里生活最久的一个地方，心态开始不一样了，会慢慢感受生活，从小区里穿过，会留意那里的一花一草。

去其他地方她都不习惯。天通苑是离回龙观很近的另一个睡城，但她去了后觉得：“好压抑呀，楼高、街道也不直。回龙观是特别宜居、特别生活的地方，特别！”

“以前没什么感觉，就一路狂奔地生活，总是匆匆忙忙。现在觉得这地方挺美的，前面那条路，特别是春天的时候，小区里伸出来绿枝红叶，像个大花园。”

作为资深的“观里人”，点点妈不像很多只是在这里睡觉的上班族那样早出晚归，她很少出回龙观，日常轨迹就是童书馆、点点的学校、菜市场、家。

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她认识的人至少有三千，社交圈里 60% 的人都在这里生活。这次来帮她搬家的美钻家，六口人都认识。日常走在路上，总能碰见熟人，出去办个什么事，有一半时间可能都在和熟人聊天，聊聊童书馆、聊聊家长里短。

和身边这些人的交流改变了点点妈。“我比较明显感觉到，自己在改变，包括亲密关系，我和老公的关系，和孩子的关系，以及邻里之间的关系。”所以，虽然卖玩具赚钱，而童书馆仅够维持平衡，但点点妈还是觉得，开童书馆的收获更大一些。

不过点点妈也有遗憾。尽管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但作为一个没有本地户口的外地人，她的孩子不能在这里参加中考、高考。她为点点办了一个天津户口，明年点点就要去那边上学，届时他们家估计要过上两地奔波的生活。

“这是我唯一不满意的地方，但这是制度问题，和这个社区没有关系。”

“还会在回龙观生活多久？不知道，如果哪一天离开了，我会想念这里的很多人和事。”

住了十几年，回龙观现在成了生命里生活最久的一个地方，心态开始不一样了，会慢慢感受生活，从小区里穿过，会留意那里的一花一草。

从白玉萝卜说起

看见庶民之美——
台湾三重、
芦洲移动与
劳动的故事

文 | 庄妙慈



2018 年结束前夕，社区伙伴工作团队拜访笔者服务的芦荻社区大学（简称“芦荻社大”），同行者包括位于高雄的旗美社区大学同仁。事后为了对芦荻的接待表示感谢，旗美伙伴特别寄来一箱美浓当季收获的白玉萝卜。为了不辜负这份食材的盛名，芦荻社区灶咖工作人员凌君邀请三芦在地社区伙伴，来自美浓且 85 岁高龄的林亭亭老先生，带着几位社大学员使用美浓人特有的方法腌渍白玉萝卜。未料同学因不熟悉制作流程导致风味不如预期，于是商请教授上海菜、大陈岛二代的廖德胜老师，为制作失败的腌渍萝卜进行救援，加入了特制秘方的花椒辣油。腌渍品获得重生，不仅保有白玉萝卜的脆甜，更增添了花椒辣油画龙点睛的惊艳。

这个看似平常的料理故事，涉及不同地方之间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食材与食物制作的生产劳动，更蕴含岛内外移动的人文故事。

林亨亨先生，1934年生，高雄美浓客家人，在高雄子弟学校任教40余年，2001年退休后随儿子定居芦洲。芦荻社大是在2015年推动食农教育到社区办讲座时认识林老师的，当时林老师非常热忱地分享自制荫凤梨和腌白玉萝卜的料理方式。

廖德胜老师是芦荻社大“家常·宴客经典中国菜”的老师，出生于中和眷村，之所以成为厨师与父亲有关。廖老师的父亲是1949年来台的军人，为了谋生，来台后拜师学艺成为一名素食厨师。廖老师高中时经常跟着父亲到达官贵人家中担任私厨，耳濡目染之下也成为素食主厨，后来又拜一位上海师傅为师，几年前在芦洲开了一间上海菜小馆，后来与芦荻社大结识而被邀请开课。

以上两位都不是三重、芦洲的在地人。被找来参与制作白玉萝卜的芦荻灶咖学员，多数也不是土生土长的在地人，有的是从山东聊城嫁来台湾不到5年的新住民姊妹、有的是在台湾苗栗农村长大嫁到芦洲的家庭主妇，也有先生是福州人现已退休定居于芦洲的商场女强人，也有从科技业退休后居住在三重的台北人。

至于凌君，10年前是芦荻的学员及志工，4年前加入芦荻工作团队，成为社区经营的工作伙伴，一个彻头彻尾在台北都会区长大的、不懂食材、不会料理的小孩，现在定居在芦洲，是芦荻社区灶咖的负责人。

这个故事里还有一个要角——成立于2017年底的芦荻社区灶咖。由于台湾的社区大学没有自己专用的校舍，必须向公私立学校租借教室，长期以来受尽没有固定场地之苦。2017年适逢芦荻社大所在的鹭江学校改建老旧大楼，原来的烹饪教室被迫迁出。于是我们决定在社区里另觅场地打造社区厨房，命名为“芦荻社区灶咖”，除了深度进入社区庶民生活以外，也希望它不只是一间教室，而是一个串起人与人关系、人与食物关系的厨房，取名叫“灶咖”（台湾闽南语意为厨房），期待能在都会区里拓展一个犹如你家我家灶咖般的亲密空间！期许以人、食材、料理等为元素，在社区里发展出富有人情味的美味关系。

这些因为不同缘由在不同时期来到三重、芦洲的住民，因为芦荻社大这所在地经营20年的社区大学而交会，都是让来自美浓的白玉萝卜变身为桌上佳肴的灵魂人物。在这个故事里，无论是人或食材或空间，都是地方感的真实展现。

期待能在都会区里拓展一个犹如你家我家灶咖般的亲密空间！期许以人、食材、料理等为元素，在社区里发展出富有人情味的美味关系。

庶民百姓为了生存离开家乡外出打拼而移动，人在他乡落地生根，宗教信仰成为辛苦劳动生活的精神寄托，神明随着庶民而移动，在寸土寸金的都会形态中，巷弄间的大小宫庙林立，是过去移动与劳动的历史见证。

先来后到与移民小岛

台湾是移民的岛屿，移动与劳动的故事不断在这块土地上演。隔着淡水河与台北毗邻而居的三重、芦洲地区，是台北都会的卫星城，因二重疏洪道的建设与淡水河围绕成一个形状像岛屿的生活圈，这座台湾岛中之移民小岛，也蕴含着许多地方的故事。

20世纪70年代随着台湾经济起飞，产生一群白手起家的自营工厂黑手头家¹，家庭即工厂，遍布街头巷弄。他们也是创造当年台湾经济奇迹的幕后英雄之一，结合原本已经在地数十年的务农家族，工、农阶层混合兼备的特性鲜明。后期再加上从东南亚及中国大陆远渡重洋嫁来台湾的新住民姊妹，劳工群聚是三芦生活圈的人口特色。近年来因都市更新、土地重划、捷运开通，三重、芦洲高楼大厦林立，带动新一波都市年轻上班族的移民潮。三波移民潮形成三个不同时期新旧移民交错的景象。

庶民百姓为了生存离开家乡外出打拼而移动，人在他乡落地生根，宗教信仰成为辛苦劳动生活的精神寄托，神明随着庶民而移动，在寸土寸金的都会形态中，巷弄间的大小宫庙林立，是过去移动与劳动的历史见证。在现代化社会的冲刷下，三芦岛上仍保有传统宫庙文化以及绵密的劳动社群关系网络，仿佛是一座看不见的村落，自成一格。

芦荻社大多数学员来自三重、芦洲，此一区域特性为劳动阶层群聚之地，“移动与劳动”是三芦地区丰富多元的人文地景，更是重要的庶民记忆，也是当初芦荻社大选择创校于此的主因。

看不见的村落，还见庶民之美

“地方”原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但“地方”一词与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一个包裹于常识的字眼，在庶民生活的日常用语中除了单纯指涉区位，也常指涉一个人和特定区位（Location）或建筑物的某种关连，包括所有权、隐私、归属感等。

人文地理学家提姆·克瑞斯威尔 (Tim Cresswell) 曾指出, 地方也是一种观看、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 抗拒世界理性化 (重视空间基于地方的观看方式) 的行动, 是人与环境丰富且复杂的相互影响。所以, “地方” 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对空间进行意义的诠释, 让我们自己决定强调什么, 贬抑什么, 因地方而衍生记忆、想象与认同等主观情感上的依附, 就是地方感。

在三芦岛上, 移动与劳动的庶民百姓不只是为生计拼搏, 也为生命拼搏, 搏的是一种人际、社群网络的凝聚, 搏回在经济挂帅底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 搏的是乡愁转化、落地生根之后, 对生活美好的追寻与行动; 搏的是一种对生命、生存、生活的尊严, 搏回对过去历史的诠释权, 并重新赋予意义, 世代传承, 成为年轻后辈重要的经验价值与资产。每个人都是自己 and 这个社会的历史学家。

这种拼搏不只是为了生计, 也是为了生存意义。不同于被收藏在权力庙堂的资产阶级美学, 平民百姓的庶民美学是一种体现在生活日常中的拼搏之美, 我称之为“庶民之美”。所以, 庶民之美, 无处不在。

虽然这座移民之岛的人来自四面八方, 因为各种原因移居到三芦地区落地生根, 任凭现代化浪潮的冲刷, “人因土而亲” 的地方感一直在这个看不见的村落持续生长。在一个外地人的新故乡谈“原乡”, 其实是一种乡愁的托付与投射, 更多时候是被拿来用在政治选举时的人际动员。

社区经营：接地气、在地化

社区大学, 顾名思义坐落在社区中, 应秉持“以社区为本”的理念, 但理念必须有相应的条件与方法才能实践出来。所以, 如何透过“在地化”贴近庶民生活, 让民众产生认同感, 而愿意付出行动参与, 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在地化”, 换成当代的流行语就是“接地气”, 不能脱离庶民日常生活。

在地化 (Localization) 是相对于全球化 (Globalization) 而产生的概念, 意指在全球化之下地方各自发展的区域特色。“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的出现, 大概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 伴随着运输与通

不同于被收藏在权力庙堂的资产阶级美学, 平民百姓的庶民美学是一种体现在生活日常中的拼搏之美, 我称之为“庶民之美”。

1. 黑手即苦力劳动者, 头家指老板, 黑手变头家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助力之一。

讯科技改良所带来的“时空压缩”，将原本完整的国家、区域乃至地方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进行转变，但是，全球化的网络与流动空间，必须藉由地方空间的实践与接轨才有机会实现。

2001年台湾学者提出“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辩证观点，在地领域与全球流动不应被视为二元对立的地理想象，而是由全球流动与地方特定历史的交接、重叠与共存的过程，这两种力量与社会空间是辩证发展的，任何一个地点都不仅被视为“存在”的焦点，更应该被看作一个“形成”的瞬间。所以，我们更在乎这个形成的过程，也运用这样的概念开展社区工作。

以下透过几个社区工作的案例分享芦荻社大如何运用“在地化”以及“共创地方感”作为社区发展的方法。

以神为名：神将文化体验营

芦洲地区在台湾的开发史上其实发展很早，旧名为“和尚洲”，因为淡水河的冲积形成许多沙洲，造就非常肥沃的耕地，早期人口务农占地利之便，兼具河港的繁华。随着先民开垦时带入的信仰，宫庙林立，每年农历九月十九观音菩萨出家纪念日前一天，在地信仰中心涌莲寺会联合在地所有宫庙神将阵头出巡绕境，为民祈福，居民则会在自家门前摆设香案、备妥水果恭迎圣驾，相当热闹，俗称“芦洲大拜拜”，是芦洲地区每年的重要盛事，近百年来未曾改变，即使都市快速发展也仍维持传统，只是形式逐年简化。

面对这样的地方盛事，社区大学当然不能置身事外，但作为一个成人学习的教育单位，该如何与在地的信仰民俗发展关系呢？2014年我们接受芦洲区公所委托摄制《神将的故乡》纪录片，藉由影片拍摄的需要进行田野调查，深入了解芦洲在地宫庙的故事，并在拍摄过程中认识各宫庙的神将会。在庙会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阵头种类繁多，形式各具，其中负责扛起巨大神将偶的人称为“神将脚”，而神将会就是由神将脚组成的团体。这次的拍摄激发出举办神将文化亲子体验营的构思，并于第二年付诸实行。

2015年我们举办了在地首创的神将文化亲子体验营，让这些神将脚现身说法，分享自身的生命经验，并引导民众体验扛神将的滋味。

我们还会透过专人指导让民众钻进神将偶中，也做一回神将脚。平常在庙会出巡时看见高大威武的神将，竟然可以近在眼前甚至置身其中，不再神秘令人畏惧，对社区民众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大家都携家带着踊跃报名。

透过这个亲子体验营，父母与孩子的亲子关系得以柔软地在文化的底蕴下拉近，而社区民众也因此更了解并深刻体会民俗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珍贵意涵，并跳脱信仰的局限，以更宽广的文化面向看待传统民俗及宫庙神将，也更认识芦洲在地的文化特色；而神将脚也因为在这样的社区活动中公开现身，从而更有自信去发展与现代社会的关系。

芦洲神将数目及精致度属台湾第一，一向有“神将窟”“神将的故乡”等美名。宫庙文化是芦洲地区的在地资产，2015年之后由区公所举办的神将文化祭，每年都将神将体验纳入其中。除了每年的芦洲大拜拜神将出巡的盛事之外，芦荻社大也持续举办在地小旅行，将宫庙神将纳入在地文化探索点之内，这些尝试正在创造民俗信仰与现代社会相互滋养共生的条件，并建立社区认同，让民众更加了解自己所在的文化生活圈。

透过这个亲子体验营，父母与孩子的亲子关系得以柔软地在文化的底蕴下拉近，而社区民众也因此更了解并深刻体会民俗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珍贵意涵。

在地小旅行：消失的传统 技艺与不一样的地方创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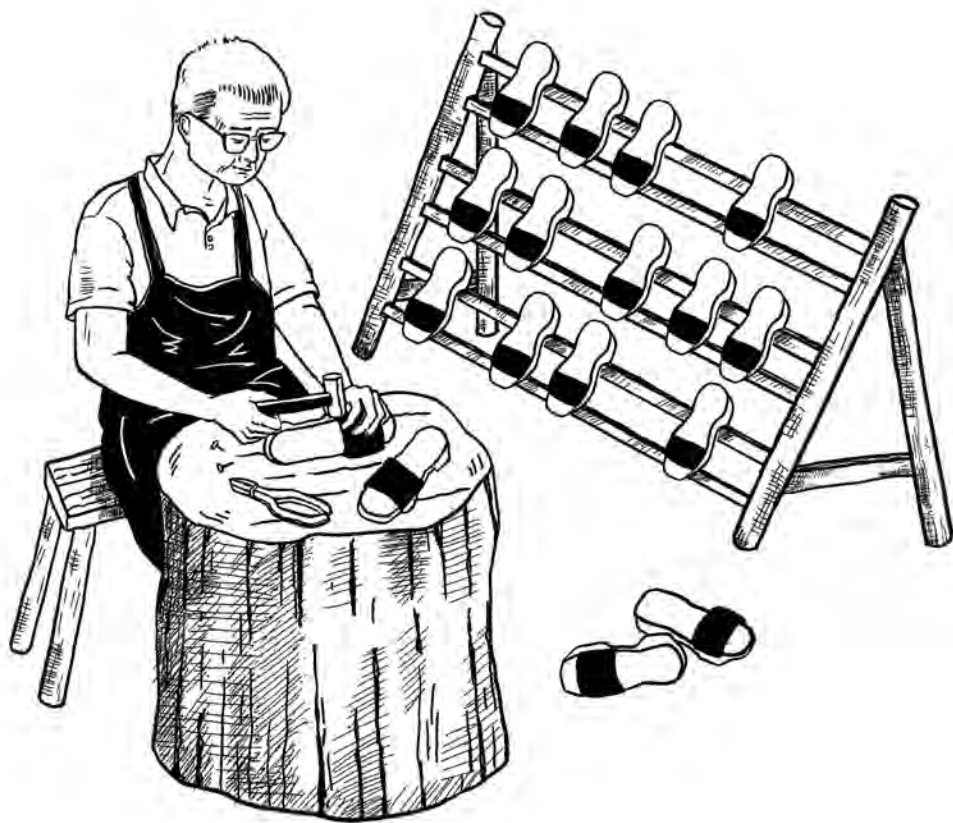
木屐又名“查甲”或“目甲”（台湾闽南语发音，南北部称呼不同），意指用木头制作的鞋子。用未经加工的天然木材所制作的“木屐”，让双脚回归最原始的触感，是古早人（台湾闽南语意指旧时代、古时候的人）爱用的环保概念鞋。“扣！扣！扣！”走路时木屐所发出的声音，是老一辈人的共同记忆。然而，随着价格便宜的塑胶鞋普及，人工越来越高的木屐生意大受影响。

木屐从发展兴盛到衰退没落，也诉说着芦洲在地历史与经济发展的故事。芦洲在台湾光复时期有70多家木屐业者在中山二路开店，使得这条路成为有名的“木屐街”，光在台北县市，全芦洲木屐店一天的销售量就有10000多双，外县市的木屐，很多都是从芦洲进货的。

现在的他是木屐达人，也会自称木屐第三代传人。谈到木屐，他眼睛发亮，侃侃而谈，从前的沉默寡言不擅表达早已不复见。

芦荻社大有位志工叫李有谅。有谅的阿公李全城创建全城木屐店，三个儿子开枝散叶，都在木屐街开店。有谅的父亲李志富是当时木屐的专属大盘商，而其他两位兄弟则是大小盘商，所以只有两间店面，在门口卖木屐。随着塑胶拖鞋在工业化下的快速普及，其便利性及生产速度，使得木屐产业面临严峻挑战。时代的演进导致中山二路的木屐店一家接一家地关门，最后只剩有谅家族的两间店面，而有谅家里的店面则更改为小型模具加工，持续至今。

2013年芦荻社大展开各项社区工作计划，以“移动与劳动”为视角整理在地居民的口述历史，才得知正值青壮年的李有谅家族三代一直都在芦洲从事木屐产业，于是在次年举办了一场木屐分享会。当时有谅的专业是模具加工，却从此一头栽进木屐文创饰品的研发世界。现在的他是木屐达人，也会自称木屐第三代传人。谈到木屐，他眼睛发亮，侃侃而谈，从前的沉默寡言不擅表达早已不复见。有



谅身上强烈的传承使命感，也激励了芦荻工作团队中的年轻人。

张荣真，1992年生，土生土长的三重人，也是移民到三芦岛的第三代；念大学时到芦荻社大实习、工读，毕业后成为正式工作人员，至今六年多。荣真的阿公从淡水移居到三重，开设中药行，后由儿子接手，开业六十多年，是三重地区小有名气的老药房。

年轻的荣真虽然从小在三重长大，但对于生活就学的地方并没有太多认同与情感，即便在芦荻社大工作，也是一直在寻找自己对社区工作的界定与答案。直到看见有谅认真投入没落的家业，她才开始认同自己在地人的身份，联合社大其他年轻人和有谅一起组织了“老干新枝爆青芽——芦三小团队”，2016、2017连续两年举办了三芦在地小旅行，并把有谅家的木屐、荣真家的中药行都列入参访点，希望以这个团队组合号召在地青年人认识在地文化，凝聚在地认同，通过集体行动共同创造出属于年轻人的地方感。所谓地方，可以指涉任何空间、地理位置，它并不局限于“原乡”，更可能是随着人们移动与劳动而落脚的日常生活住居之处。

所谓地方，可以指涉任何空间、地理位置，它并不局限于“原乡”，更可能是随着人们移动与劳动而落脚的日常生活住居之处。

庶民观点的《三芦社区报》

2011年，芦荻社大秉持庶民办报的精神，创立《热炒久久·三芦社区报》，对各行各业的社员进行在地培训，从社区踏查、采访、写稿、编辑、送报，全部自己动手来，试刊整整一年才正式创刊。七年来，这份社区刊物定期发行三重、芦洲二百多个新闻站及派报点，刊物内容从实用性的生活知识到环境生态的认识、从庶民的心声到劳动百工的人文关怀、从社区大小事的报道到社会议题的探讨，社员们不仅对出刊事务驾轻就熟，并且实践出“社区人报道社区事、在地人写在地事”的阶段性的目标。

一份在地刊物所涵盖的意义多元而丰富，在社区经营上所发挥的效应更是巨大。成员来自社区，他们是学习者，也是报道者，同时也是行动者，透过这份媒体的制作，认识公共、报道公共、现身公共、参与公共，除了刊物本身作为发展社区关系的伴手礼之外，内容的制作也是共创地方感非常重要的一环。发行初期的试刊阶段，我们曾经制作过“移动的时光·共同的记忆”专题，邀请社区报参与成员分享亲身的经验，后来这个专题报道引起非常大的回响，民

这些庶民记忆的出土，以一份社区报纸集体展现，让说故事的主角和听众都能够更好地肯认三芦移民岛上的人与事。不管久居或暂驻，大家都有移动与劳动的故事，这是每位庶民百姓身上共同的记忆，也是这块土地上珍贵的文化资产。

众踊跃投稿，连续几期，欲罢不能。很多女性成员都娓娓道来在三重、芦洲落地生根的故事，她们都是早期从农村移居到都市讨生活的女性劳动力，跟着丈夫一起落脚在三重、芦洲，夫妻俩经营小工厂，辛勤工作，是创造台湾经济奇迹年代的幕后英雄之一，众多“黑手变头家”故事里的头家娘，也是三芦移民岛上最经典的劳动故事主角。

这些庶民记忆的出土，以一份社区报纸集体展现，让说故事的主角和听众都能够更好地肯认三芦移民岛上的人与事。不管久居或暂驻，大家都有移动与劳动的故事，这是每位庶民百姓身上共同的记忆，也是这块土地上珍贵的文化资产。

都会新生活·共好新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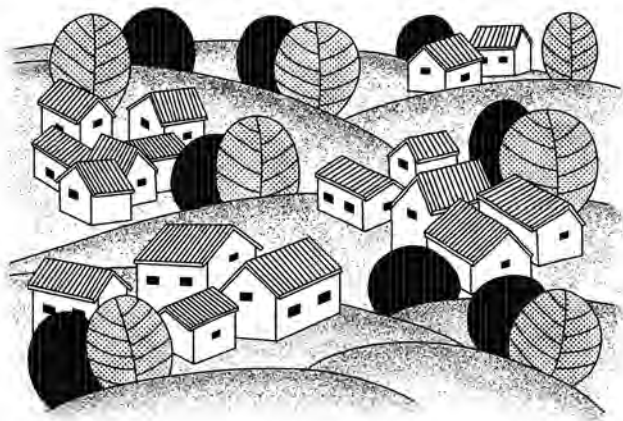
人不能离开土地，无论是生存或生活；人因土而亲，无论来自何方。

地方，存在于庶民的日常生活；地方感，发生在社群的关系活动之中。

芦荻社大以“共创地方感”及“在地化”作为社区凝聚与文化认同的方法，贴近庶民生活，发掘在地特色，并设计相关教育活动与课程，激发社区民众公共参与的动力，发挥由下而上的精神，回到以社区为本的目标，这是教育者和运动者应尽的职责，也是社区大学的使命之一。

2019年芦荻社大将满20岁，作为一所坐落在都会区、在地经营20年的成人学校，我们提供学习资源，催化各种学习社群的形成，让社区居民透过绘画、影像、文字、烹饪、音乐舞蹈等多元化的表达形式，再现庶民记忆，呈现成人之美，学习之乐，共同打造“都会新生活·共好新村落”这样的“好地方”。它不只是一所学校，更是我们对未来的期许。

移动与劳动的故事不分世代一直在上演；不分你我，不分组织者或社区居民，都在共创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感，打造属于我们的新村落！



从农村到都市
漂¹的春风少年兄
青春孤女的愿望
漂洋过海的姊妹花
先来后到
为生活打拼的人们呐
日久他乡变故乡
或是人亲土更亲
落地生根 处处是我家
落叶归根 还给亲爱的土地吧
在这移动与劳动的三芦岛上
故事正在上演，关系正在发生
成人之美 学习之乐
都会新生活 共好新农村

■ 庄妙慈 台湾新北市芦荻社区大学社区中心执行长，庶民之美影像方案指导老师，《热炒久久·三芦社区报》社长。

2. “漂¹”，此处读作“撇”，是台湾闽南语发音的词汇，意指英俊潇洒。

感受地方

文 | 陈顺馨

出生于香港且度过大半辈子的我，读着五个有关地方感的故事，虽然没有一个发生在香港，却有一种异常的熟悉和亲切，能感同身受作者在人物呈现中所饱含的情怀。事有凑巧，五个故事发生的地方，回龙观和大理我去过；众多的故事人物中，点点妈我认识；连那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偏远山区广西南丹，我也有幸通过社区支持农业的方式，吃到那里两位转型有机种植农户的农产品。为此，较容易对大家的生活经验与文化生成产生共鸣。以下尝试结合我自己的观察与体验，回应故事带出的一些观点。

因为爸妈曾在家乡广州番禺生活，所以老广州甘宁笔下的生活点滴及琐碎日常，我小时候曾从爸妈口中听说过。例如儿歌“点虫虫，虫虫飞，飞到荔枝基”，妈妈跟手抱的小孩玩的时候，口中必会唱起这歌，只是我当时不知道荔枝基原来是典型的岭南水乡特色。后来跟爸妈回乡探亲，穿过仍然住着或远或近亲戚的石楼镇小巷，一路在父母的指示下打招呼叫“大姑妈”“二伯娘”等，虽然这些未必真是我们的直系亲戚，但由此亲身体验到乡镇里的亲密人际关系。虽然番禺后来已经被城市化改写，“鱼米之乡”的面貌已不复见，但祠堂仍然是社区的公共空间及中心，端午赛龙舟仍然让附近很多村落都沸沸扬扬热闹非凡。

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一家办事，全村支持”的传统农村互助精神，不仅存在于新界的村落，像我父母那样移居到香港后住在城市边缘的贫民区或公共屋村的“打工仔”，也活出了这种精神。例如我家居住的和乐邨，是早期的公共屋村之一，生活空间很狭窄，但神奇的是，每年祖母生日，母亲竟然能在面积不足 300 平方尺¹ 的房子内“摆酒”，还能连开几席。巧妙的做法是安排每次开两桌，吃完收拾后再开，连续几轮。这样的流水作业靠的是母亲的总动员能力，姨妈姐姐、左邻右里等，都会热情地帮忙洗菜、切菜、炒菜、摆桌、收桌、洗碗，一一包办。外面的走廊则成为等候区，未入座的亲戚朋友就坐着聊天，非常热闹。现在想来，这种情景真类似庄妙慈写到台湾移民社区三重、芦洲的那种“神明随着庶民而移动”现象：农村生活文化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的移民潮来到香港，扎根在物资仍然相对匮乏、邻舍之间需要互相依存的庶民社区中，形成香港早期的所谓“狮子山下”精神。这里，没有了宗族或血缘关系的维系，取而代之的是新生活的需要与原来乡间美好生活的集体记忆。



台湾作为一个早期的移民社区，跟香港有相似的地方：移民主要来自中国大陆，都跟 1949 年前后的政治息息相关。不同的是，移入台湾更多是随国民党撤退的军人和眷属，例如住在三重、芦洲的廖德胜老师。而香港容纳的更多是在边防仍然松动的时期为了生活而来找工作的移民及家属，我的父母也是其中之一，及后来躲避政治运动而逃出来的非法移民，庶民味道更重。此外，国民党出于政治考虑而提醒移民不要忘记家乡，而英殖民政府则为求稳定社会而鼓励移民忘记自己从哪里来，进而以香港为家。当然，移民对一个地方是否能建立归属感，政治口号并不是关键，找到生活资源才能落地生根，正如庄妙慈在三芦地区的观察，“在一个外地人的新故乡谈‘原乡’，其实是一种乡愁的托付与投射，更多时候是被拿来用在政治选举时的人际动员”。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及香港的工业起飞，均促进了以经济为基础的本土化历程，但更深层次的地方感的产生，即庄妙慈指出的，“移民与劳动的庶民百姓不只是为生计而拼搏，也为生命拼搏，搏的是一种人际、社群网络的凝聚，搏回在经济挂帅底下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搏的是乡愁转化、落地生根之后，对生活美好的追寻与行动；搏的是一种对生命、生存、生活的尊严，

1. 此处平方尺为平方英尺，1 平方英尺约等于 0.0929 平方米，300 平方英尺约等于 28 平方米。

搏回对过去历史的诠释权，并重新赋予意义，世代传承，成为年轻后辈重要的经验价值与资产”，需要如台湾社区大学的参与者那样，懂得利用耕种、食物、传统手工艺、本土神明、社区报等方式“接地气”，营造“人因土而亲”的村落文化氛围，让一个“看不见的村落持续生长”。在香港，这种意义上的地方感比台湾来得迟些，最初只是由少数通过生态农耕“接地气”及实践社区支持农业的前行者作出个别的示范。能够形成一种氛围的，是受益于十多年前被称为“本土运动”的推动者，从市区地标保育（如反对清拆喜帖街、天星皇后码头等）转向乡郊土地保育（如反对清拆菜园村、东北发展计划等），让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回归土地、连接大自然、躬亲耕种、重视传承、建立互信互助的社群关系并实践另类生活（例如生活馆、马宝宝农场、生活书院、乡土学社、活耕建养地协会、土丘等）。

霍伟亚呈现的北京回龙观是另一种混杂的移民社区，那是老城拆迁后的北京市民及全国各地的年轻北漂组成的内部迁徙移民构筑而成的城市边缘生活空间。与台湾及香港不同的是，这类内部迁徙的移民没有“乡愁”，或者说，“原乡”不会因政治原因而回不去或者不想回去——对年轻北漂而言，那是随时可以退回的“老家”；对北京清拆户而言，那是完全消失了的旧区。但相同的是，最初移居进这个所谓“亚洲第一大社区”时，个体之间的陌生感与疏离感，应该不比离乡背井的新移民低，“睡城”这个称号某种程度标示了这种疏离关系的一个面向：人与床之间比人与人之间亲密。不过，通过北漂之一的点点妈的故事，霍伟亚让我们看见生活的力量如何改写一位普通妇女的生命历程，以及由此建立起的社区网络及自身的归属感：从卖玩具到办童书馆，点点妈的拼搏心态逐渐转化为“观里人”的身份认同，留意那里的一花一草，认识至少三千多位社区居民。可惜的是，制度上的限制让像点点妈这样的外来人口，就算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也没法拿到北京户口定居下来，让孩子入学就读，最后不得不离开已经落地生根的地方——我在香港见到点点妈的时候，她确实已不在北京居住了。在这个意义上，回龙观这样的内部移民社区会有较大的流动性，较难如台湾三芦社区那样“接地气”，建立深厚的地方感。除了制度上的限制让点点妈这样的北漂居民没法留下之外，我在猜想，房子被清拆而搬进回龙观的北京市民，随着北京深厚的地方文化底蕴被急速的城市化及全球化历程所削弱，富有地方色彩的建筑、食物、传统手工艺等逐渐消失，人际关系逐渐疏离，他们也难以在一个居住了50多万人的社区，寻回原有的老北京生活氛围，也可能不会一辈子或世代代住在回龙观。也许，流动是另一种地方感，正如点点妈在访谈最后说的：“还会在回龙观生活多久？不知道。如果哪一天离开了，我会想念这里的

很多人和事。”记忆会成为个人连接一个地方的永恒桥梁。

在内地，急速改变的不仅是诸如广州、北京等大城市，全国各地的偏远地区及农村都逃离不了被空心化或原子化的境遇，或是被纳入城市发展、旅游发展的规划当中，导致生活与传统文化都逐渐被改写。然而，没有随着内部移民潮流移居到城市的老一辈村民，当中有些人会以他们的记忆与道德责任，担起文化遗产的任务，云南大理上关村的故事是其中一例。活化人们对位于大理著名景点苍山洱海中间、曾经是鱼米之乡的上关村的方式之一，是筹备一个社区展览室。这是一个由当地老人协会主持的项目，包括让村民修订自己家的族谱，调查和学习自己的传统文化，并收集整理当地渔业和农业的相关资料和故事，从而通过展览教育下一代，增进他们对自己成长的地方的情感与责任感。故事以田野笔记的方式书写，通过作者的眼睛和观察，我看到了这种参与式的文化建构工作有趣的地方。首先，村子虽然空心化只剩下老人与孩子，但他们并不是被问题化或视为服务对象，而是参与文化维护与创造的主体。其次，经验、知识与记忆是老人的财富，筹备展览室的过程让这些财富得以充分利用、展示和获得肯定，那不是怀旧之举，反而富有内外双重的教育作用，促进当地年轻一辈和外来游客共同反思当下生活的意义，正如作者所说：“传统文化的价值是对外的展示，也是对内的认知与实践，而它的意义不仅是传承，更是不断地反思与创新，重新寻找其对当下生活的意义。在变动中，寻找个体的走向，寻找村庄的未来道路。”台湾与香港的农村也正在经历类似的过程，我刚巧在香港一个经历了农渔业先后式微的农村，参与其中的口述历史计划，也在梦想一个地方展览馆的出现，这种工作方式很值得学习。在我的经验里，从历史中寻找地方感非常有效及重要，能提供一个纵向的时间维度与视角，让脚下的土地和当下的人、建筑、关系与生活变得立体，也让我们充分认知到，现在拥有的是那么的来之不易。

同样用田野笔记方式书写的《奈何制衣》，作者汪斌细致并系统地呈现了广西南丹县白裤瑶族在服饰制作上的自然之道与文化动因，让我更加佩服这个偏远山区民族的智慧、合作性与坚持。之前因订购那里的有机食物而得知，大米、玉米、黄豆等是农民长期留种的老品种，酒是用野生葡萄手工酿的，西红柿酸是自己种的西红柿发酵的，腊肉是用自家的猪肉制作的，等等，无一不体现该地区的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生态以及该民族的生活智慧与合作精神。原来，穿在他们身上的漂亮服装也在诉说同样的道理：没有丰富的生活累积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没法抵挡商品化潮流的冲击的，而服饰制作，由妇女们把关。我认为，“外婆—母亲—自己、姐妹”

在我的经验里，从历史中寻找地方感非常有效及重要，能提供一个纵向的时间维度与视角，让脚下的土地和当下的人、建筑、关系与生活变得立体，也让我们充分认知到，现在拥有的是那么的来之不易。

地方感可以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包括地域、空间、界限、自然环境、政治环境等面向，但更重要的是涵盖了人或族群在这些地域、空间、界限、环境中的日常生活实践所创造及积累的文化和历史。

所连成的工艺传承学习及制作互助小组，已经不仅是家庭这个社会单位在发挥力量，还有性别及社区的元素。传统上，纺纱、织布、缝纫、刺绣都是妇女的活儿，这是出于定型化性别分工及想象，也就是所谓的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但现在农村的情况是，男人多出外打工，女人多在种地并处理生活琐事（当然也有年轻女性出外打工），根本没有时间做衣服，手工艺技术自然失传。依我所知，无论男女，白裤瑶族出外打工的仍然是少数，男耕女织某种程度上仍然可以维持，但妇女也得参与农活儿，特别是在农忙的时候。所以，妇女为了维持“威要”荣耀或个人体面，要付出额外的时间与劳动。此外，汪斌提到，“邻里互助亦是白裤瑶服饰制作的重要补充形式”，强调的是大家守“规矩”所形成的公共意识，让互助得以发生，但按照我过往的经验，我认为妇女之间较强的情感联系、较重视沟通与合作的倾向，也是制衣过程展现社区互助精神的重要原因。

总的来说，地方感可以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包括地域、空间、界限、自然环境、政治环境等面向，但更重要的是涵盖了人或族群在这些地域、空间、界限、环境中的日常生活实践所创造及积累的文化和历史。简单说来，没有日常生活，就没有地方；一个地方没有文化底蕴或历史感，就没有地方感。

感谢各位作者以自白、人物故事、田野笔记等形式，分享这些精彩的生活经验，呈现不同地方的独特感觉。



■ 陈顺馨 土生土长于香港，曾任教于岭南大学，并进行有关生态、生计、妇女与和平的行动研究，过程中有机会深入内地、香港、台湾三地的农村并接触生态农耕议题，觉察需重新向大自然及土地学习，故退休后开始在香港新界东北一隅的南涌耕种并参加土地保育工作，现为活耕建养地协会的执委会成员。

第二部分

行动者

堆肥笃农家： 堆出健康 土壤，堆出 农业未来

文 | 彭月丽

“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想要在离开之前做一件事……”2018年10月，池田老师找到我，说了一番话。听到这句的时候我心头一紧，看着早已白发苍苍的池田老师，莫名的悲伤不觉涌上心头，满是心疼。“不会的，池田老师身体还很健康，您干起活来力气比我还大……”我掩饰得有些刻意，匆匆回答了老师。“不不，我已经83岁了，我也觉得还可以再做下去，但是我的签证还有一年就到期了，因为年龄问题估计很难延期。你知道，现在的土壤问题很严峻，堆肥的事情很重要，如果有人愿意学习，我希望在离开之前把这些年的积累分享给大家。”

听到这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梦想开始于当下的问题

池田秀夫，1935年出生于日本福冈，1995年从传统媒体行业退休。退休之后发愿做中日韩交流的国际志愿者，于是开始学习韩语和汉语。1997年来中国，想看看可以在中国做什么样的志愿者工作。来中国途中，正值小麦收获的季节，飞机因为秸秆燃烧的烟雾而延迟降落，这事引起了池田老师的关注，随即开始调查具体的原因。研究后他发现，中国农村因为秸秆燃烧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农民种植过程中使用大量的化肥，最后又把秸秆等有机物当作垃圾烧掉，土壤则因为缺乏有机质而严重板结。虽然不是农业专业出身，他却决定要去深究这个悖论并设法找到解决之道。

于是，池田老师申请到山东农业大学学习。那里的老师被他的热心与热情所感动，尽力协助他学习农业基础知识，并提供方便使用图书馆资料。除了学习书本知识以外，他还经常跟农大的老师到田间实地考察，与农民交谈，了解当前土壤的问题与现状，并到实验室学习土壤和农作物的检测。就这样，池田老师不厌其烦往返于中国和日本之间，往返于田间地头、图书馆和实验室之间，只为寻找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进行土壤改良。



认真研究农业，解决土壤问题

认识池田老师是在 2005 年，那时候我正读大二。当时也是“一枚”爱学习的“学霸”，周末的时候我喜欢到学校的农田实验站溜达。有天像往常一样，在实验站一边观察一边背诵我的日语课文，恰好被正在那里做实验的池田老师听到。他走过来，耐心地指出我的发音问题。得知他是日本人，愿意给我指点发音，我很开心。就这样，他每周过来学校做实验，顺道也教我日语，还送我日语元音练习本，教我如何工整地书写日文。

除了日语的学习，我们也会聊到农业的问题，尤其是土壤问题，由此我得知他当时正在研究如何根治土壤的连作障碍。那时候，他和园艺学院的老师正在研究山东非常严重的番茄根结线虫病问题。他不认同使用化学药剂杀灭根结线虫，“只要有一只没被杀死就会卷土重来，是不是？根结线虫的问题是因为土壤生态失衡，缺乏生物多样性，只有通过有机质才能恢复土壤的生态……”当时我还不完全理解他的说法，但是直觉非常可信，我要站在他这边。

一年以后，池田老师主持的使用树皮堆肥改良土壤根治根结线虫病的实验成功了，番茄生长恢复正常，根结完全消失。那一刻真

他不认同使用化学药剂杀灭根结线虫，“只要有一只没被杀死就会卷土重来，是不是？根结线虫的问题是因为土壤生态失衡，缺乏生物多样性，只有通过有机质才能恢复土壤的生态……”

为他欢呼。池田老师曾经说：“只要持续地做，一定会有答案。”他做到了，用十年的时间从一个农业外行转身成为一名农业专家，解决了当时众多专家都难以解决的问题。

之后，很多人邀请他去做培训，还有公司邀请他一起引进树皮堆肥。他应邀去了，也和日本的树皮堆肥公司联络，希望把树皮堆肥引进中国，帮助解决土壤连作障碍的问题。

研究推广在地堆肥

当时学校也引进了树皮堆肥继续做栽培实验，我还跟池田老师一起去一些农资展销会推广树皮堆肥。不料第二年，树皮堆肥在进口的过程中因为检疫问题被海关扣留。池田老师说，进口堆肥成本太高，手续也很麻烦，“由此看来，堆肥一定要用在地的材料由在地的人来做”。于是他开始研究在地堆肥技术。

在他看来，所有的有机物都可以用作堆肥。那时候我们学校旁边有一条河，有人把很多芦苇割下来准备烧掉。池田老师发现后，马上找到他们，问能不能把这些材料拿来堆肥实验。于是，每天下课后，我就跟池田老师一起用这些材料做堆肥。因为只是做实验，也没有资金购买粉碎机，于是池田老师就买了两把修剪冬青用的大剪刀。我们俩就用剪刀一把一把地将芦苇剪碎到3—5厘米长，整整剪了一个星期，才准备好一堆堆肥的材料。为了保证一定的碳氮比，我们还买来了一袋鸡粪。没有堆肥温度计，我们就用竹竿和玻璃温度计做了一个可以插到堆肥内部的温度计。就这样，我们开始了第一个堆肥实验。

完成一堆芦苇堆肥以后，老师拿去做种植实验。后来，用了芦苇堆肥的种植实验很成功，随后，他开始教农民做堆肥。最初，没有人愿意做，他就自掏腰包给农民埋单并承诺说，如果有损失他来赔偿。开始的时候他在山东烟台一家果园的一小部分田地做实验，和那家农民一起用当地的玉米秸秆做堆肥，腐熟后作为肥料用到果园里。经过两三年的实验，不仅改善了果实的品质，也扭转了果园原有的大小年现象。

这次的成功给了池田老师很大信心。后来，寿光农业局和当地



的一家企业还邀请他一起利用当地的材料建堆肥厂。与此同时，只要有人提出对土壤改良和堆肥有兴趣，他都会答应一起研究，直到问题解决。

新农人培养

在池田老师推广堆肥和土壤改良的过程中，很多人听到总会说“很好很好”，但邀请一起做的时候却往往回复“我不能做”。有些事情虽然不难，但如果需要持续地去做，大家就比较容易拒绝，不管它的有效性如何。比如，做堆肥改良土壤，大家会说成本很高，需要很多体力而拒绝，宁愿选择短效的化学肥料或者农药，即便这些化学制剂会破坏土壤环境，影响农业的可持续性。

自 2017 年以来，池田老师经常拜访从事生态农业的新农人，发现善始不善终的现象非常普遍。开始的时候大家兴致勃勃地制作堆肥，最后却成了垃圾摆放场，既不能持续地观察堆肥的发酵状况，

“一定要知道我们行为的目的是什么。”池田老师说：“事出有因，这是一条自然法则。”在他看来，只要循着问题去找，一定能找到原因，答案也在这个原因里。农业之道来自自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认识自然的规律，而观察就是认识自然的根本方法，只要去认真观察，不断问“为什么”，就一定能找到答案。

也不能如期翻堆，最后没有发酵完成，出于需求也会勉强使用未腐熟的堆肥。

很多人喜欢做有机物覆盖，但覆盖过的土地往往仍然杂草丛生，干燥无活力。老师问：“为什么做覆盖呢？”大家通常答不出来。老师说：“看吧，大家喜欢覆盖只是因为这样做比较简单。”

“一定要知道我们行为的目的是什么。”池田老师说：“事出有因，这是一条自然法则。”在他看来，只要循着问题去找，一定能找到原因，答案也在这个原因里。农业之道来自自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认识自然的规律，而观察就是认识自然的根本方法，只要去认真观察，不断问“为什么”，就一定能找到答案。在生态农业和堆肥工作坊中，池田老师经常强调这一点，这也是他亲身实证过的道理。

2018年，依托沃土可持续农业发展中心¹的返乡青年生态新农网络，我协助老师启动了“堆肥笃农家”项目，在全国不同区域组织生态新农友学习，旨在培养一批能研究、肯实干、会传播的生态农业种子人才，掌握堆肥的原理与技术本质，能够独立观察和思考，根据各自本地情况活学活用，研究适合本地材料的堆肥技术，并促进堆肥技术的传播与推广。这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池田老师想要找我一起着手的那件事。池田老师说：“生态农业的发展要靠大家，未来生态农业的希望就寄托在这样的新农友身上，我希望通过多年的经历告诉大家，大家可以做得更好。我60多岁才开始都可以做到，大家更加可以做到。”

为了堆肥笃农家工作坊，80多岁的池田老师频繁穿梭于不同的城市，经常是一场培训连着一场培训。每次看见池田老师在候机楼或者课间打盹休息，我都觉得特别感动。曾经有位农友拍了一张池田老师课间坐在椅子上打盹的照片，后来用作了电脑桌屏。他说，每次看见老师这张照片都会感到莫大的鼓舞和力量。

池田老师的授课每次都有新内容，可以看出他对每场培训都很用心，而且一直在学习，结合大家的需求和反馈持续不断地改进授课的内容和方式。有一次，两个工作坊连着办，赶路已让人疲惫，老师却还在途中修改讲课内容。我很纳闷，忍不住追问原因，老师回答说：“我一边休息一边思考。”他就是这样，一直专注于更好地传授堆肥与土壤改良的方法。

堆肥材料的碳氮比至关重要，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碳氮比的方

法，池田老师绞尽脑汁，终于在一次工作坊中想到一个图文并茂深入浅出讲解碳氮比的方法，让大家一目了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你这样的专业教育背景，一定要找到大家能够理解的办法，为此我一直在考虑和琢磨。”池田老师跟我说。参加过堆肥笃农家工作坊的农友大多反馈说，堆肥课程内涵非常丰富，跟老师学习到的不只是堆肥的技术，还有他对于农业和土壤的热忱，观察自然与认识自然的思维方式，以及研究生态农业技术的方式方法，更重要的是他那种专注笃定的精神，这一切都让人终身受用。

自2018年10月开始堆肥笃农家工作坊以来，池田老师一直让我担任助教，我知道这是老师有意要培养我。有一次在工作坊中，我讲完负责的部分之后就到一边喝茶休息，没有加入大家的自由讨论和交流。等大家都走了之后，池田老师跟我说：“你要做的不仅仅是教给大家一些知识，还要去了解他们。”我感觉好像被当头棒喝一般，突然意识到自己被知识本身灌醉了，忘了知识只是工具，人才是根本。池田老师讲堆肥也并不只是讲堆肥，更重要的是作为引路人，帮助大家意识层面的成长，打破思维的限制，找到自己本自具足的独立观察、思维与行动的能力。这么一来，让我幡然醒悟。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每每想到池田老师，我总会想到清代郑燮的《竹石》，这首诗可谓池田老师在中国二十余年经历的写照。从当下的问题开始探索，一旦决定了方向就义无反顾，坚持不懈，直到问题解决，就是这种笃定的精神成就了今天的他。

池田老师一生都在学习。退休后他用了十年时间钻研农业，再用了十年时间研究推广堆肥。如果再有十年时间，池田老师一定可以带领我们找到每个人内在的成长路径，以堆肥和生态农业为媒介，找到自己本具的智慧和能力，了解自然，成为自然，创造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为更美好的世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万般庆幸，我们已经启程。

■ 彭月丽 沃土可持续农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广州、成都等多所田间学校联合发起人，沃土农耕学校教务协调人，堆肥笃农家项目讲师。

1. 沃土可持续农业发展中心成立于2014年12月，是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民政局正式注册的民办非营利组织，通过参与农场或农户生产方式转变过程中，协力新农民技术提升，减少外来投入，从理论到技术范畴，引入可达到自然农业或生态上合理的可持续农耕方法。自成立以来，出版《可持续农业》杂志内刊，组织生态农业相关培训，在不同区域发起田间学校，传播可持续农业技术与理念。

脱掉包装 的买卖 关系

文 | 凤娇

“新村小商号”是一家位于台湾新竹的无包装小店，致力回归内心本质的减废生活，减少一次性包装垃圾，鼓励重复使用包材，推动消费者使用手边既有容器，来填充茶米油盐及清洁等各项所需。

“新村”是指1949年以后来台军眷聚居而成的村落。新村小商号创办人之一的拉拉，因为爷爷是来自天津的军人，所以从小在眷村长大。村里的婆婆妈妈，都会有一份自己的生活地图，知道买米要跑远一点跟村尾的杂货店阿嫂买，那里才便宜又实在；生病了一定要找对面的大夫打针，两天就可以康复；理发就找巷头的小姐，技术纯熟又不会一直问你的小孩考第几名。那是婆婆妈妈经年累月用心琢磨后，才画给家人的地图。

搬离眷村后，我们想起一群好朋友，这些百工认真地为我们准备日常所需。看着他们，我们也开始学习有意识地用双手建立更圆满的生活方式，用心缩短人际距离，并且深刻体认到，过多的物质贪求有时反而让生活一团糟。

新村小商号就是我们想分享的生活地图，每个人也该有属于自己的一份。

脱掉一次性包材，让包装垃圾少一点

有很长时间我们都迷思于：换上一个“好”的包装，就是让商品大卖最快的捷径。“好”的包装是指：最能打动目标客群的设计，喜气的、气派的、文艺的、实用的，不需要太精进内容物的质量，只需要换包装就可以。

的确，相衬的包装更抓人眼球，更不会让生产者的用心付诸流水；然而，有多少时候，我们不因内容物的讲究而购买，单纯为了短暂拥有那些漂亮的包装而埋单。

这样一条“生产—消费—丢弃”的单向线性模式，便是造成全



球废弃物失控的主因。新村小商号作为一个极微型经济体，示范性地演示了物质的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¹，除了致力生产端商谈进货使用大包装以外，还会直接将产品装进店内的大桶，再邀请消费端自备容器并依所需用量来装填，达到从源头到消费减少甚至杜绝一次性包装废弃物的购物模式，挑战大众的消费习惯。

习惯的养成确实需要时间的适应与意识的修正，欣喜的是，不少消费者反馈：一旦熟悉自备容器的步骤，多有发现生活正向的改变——省掉囤积空间、省掉整理垃圾的时间、省掉购买包装与过量内容物的金钱。

对于较难装进大桶让消费者装填的加工品，如豆浆、花生酱、熟油麻椒等，则采取押金退瓶的方式，让玻璃瓶罐可以回归生产端消毒循环使用。以豆浆为例，每年台湾小岛会产生一亿个一次性豆浆瓶，较好的情况是能妥善回收，消耗大量水电资源降级利用，稍微延长进入垃圾焚化炉的时间；较难堪的情况则是丢弃于大自然，

1. “循环经济”一词最早于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Kenneth E.Boulding)提出，主要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

我们是多么地习惯，不在乎罐中的饮料长什么模样，这一罐芋头牛奶色泽与浓稠度跟我们自家制的有没有不同。通常我们只看品名、品牌、价格，稍微在乎成分和保存期限。这些在包装视觉上呈现的信息，搭上购物场所营造出的气氛，便主宰了我们的购买行为。

裂解为各式材质微粒干扰生态圈。相比之下，店内不断重复使用的方式，的确能够大幅减少生产瓶罐的资源消耗，也大大延长物品的寿命。

另外，就农产品与食品业来说，一次性的包装不只产出大量垃圾，而且导致“识食”能力降低。

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小时候常和父母推着购物车逛超市，初中时期第一次走进传统市场，看着一篓一篓的鲜蔬，我竟别扭得一种菜名也喊不出来！原来我从不曾真正认识一样家常菜的长相，而都是依赖塑胶包装上的标签，自以为叫得出每包菜的名字。

在经营无包装商店时，有一回为协助忘记自备容器但有购买洗衣粉需求的客人，我找了一个印有“有机燕麦”的夹链袋做循环利用，帮他装了一袋洗衣粉，没想到客人一拿到手看了看袋上的文字，坚持认为是我拿错了，他要洗衣粉，而我拿了燕麦给他。

我们是多么地习惯，不在乎罐中的饮料长什么模样，这一罐芋头牛奶色泽与浓稠度跟我们自家制的有没有不同。通常我们只看品名、品牌、价格，稍微在乎成分和保存期限。这些在包装视觉上呈现的信息，搭上购物场所营造出的气氛，便主宰了我们的购买行为。

现代的我们，离产地太远也太陌生了。当食物赤裸裸地陈列在架上，我们很难叫出它们的名字，也很难亲自去产地或者藉由阅读了解个别品项生长的环境，再用五感试着判断其质量。

种地，对于都市长大的我来说，很难。但为了夺回属于自己渺小的食物主权（Food Sovereignty）²，而不再只能单一选择相信包装上的陈述，不再被营造出的感官氛围操弄决定，不再因为特价赠品而激发消费冲动，我愿意学习去了解每件产品背后的起源，尽可能选择与环境、与劳工、与消费者共好的商品。

脱掉生产与消费间的陌生，让产销隔阂少一点

有差异化理念的产品，例如环境友善、老技艺传承等，往往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无法从成品的外观让消费者了解其背后的内

涵，二是即使附上说明，能否取得信任又是另一回事。滥用的故事营销，有时也让假故事横行，在此弊病下，产生了认证（Certification）制度——由中立之第三方出具书面证明特定产品之程序。

对消费者而言，透过认证的标签来决定购买与否，的确是个简易获得保障的方式，却可能会忽略了认证产业本身也是一项商业行为，评判程序或许有营利思维的介入；更可惜的是，也可能会将多元的农业生产技术单一化——为了定义“有机”等法定名词，法规化地去限制成特定的生产标准组合，间接否定各派别迥异且多样的友善农耕方式，去迎合利用限缩的模块来产出，并付费请特定机构来认证。这样的操作流程，除可能不利于友善农业技术的发展想象外，也对农民产生经济与行政上的负担，无形中屏除掉无能力或条件投入这套流程的农场。

尽管如此，置身于资本市场中，认证制度仍是相当有效且适合的机制，无法否定其价值，而我们想做的是提供“另一种认证方案”。新村小商号放大了“销售者”的责任，除了处理一般性的经营工作以赚取差价利润外，是不是也能作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桥梁？身为供需链上的中介者，我们期许自己尽可能地去了解生产端——包括生产者的背景故事、理念、生产方式与环境等，再以销售者的角度去阐述这些内容，来“协助导航”消费者所做的各项选择；同样地，也将消费端的质性反馈分享给生产者，来“协助理顺”生产要件的各项决策。

举例来说，店内有三项产品——美好花生酱、奇姆娃（Chimmuwa）手作织品、苑里掀海风蔴草编织。

美好花生酱可从外观辨识出品牌，采用友善环境种植的本土花生，但没有任何认证标章，虽已在台湾本岛的小众市场凝聚了一定数量的忠诚支持者，但我们仍会向所有了解与不了解的消费者描述我们看到的这对小夫妻的生活故事。报纸杂志可阅听到的一般都是，小夫妻为了与乡下的父母有更多相处时光，放弃都市稳定的文艺工作，回乡带动在地花生产业发展的故事。但我们还会与消费者分享许多亲身与这家人互动的日常小事，例如夫妻如何被老父亲以貌似香肠的石头捉弄，差点咬了下去；一家人讨论用柴烧与用电发热的热水澡洗起来有什么不同等——让消费者更能感受到创业者的温度。

奇姆娃手作织品亦有明确的品牌形象，它来自一位台湾女士在泰缅边境扶植少数民族妇女自立的工作坊。海外创业的文化差异，

20世纪90年代拉美农民组织“农民之路”最早提出了“食物主权”的概念，主张食物生产者自主地进行食物生产和贸易，反对新自由主义制度下世界贸易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对各国食物生产和贸易的控制及资源的掠夺。2008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世界各地数百名专家参与《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全球报告）》，系统地介绍并弘扬了“食物主权”的概念，《评估》认为食物主权是“人民和主权国家以民主方式自行决定农业及粮食政策的权利”。

从农夫市集的理念上讲，它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举办，藉由最直接且原始的人际接触行为，不靠包装风格或标章认证，除了产品过往塑造的品牌认知外，更关键的是小型生产者的个人品牌基础，让产销两者在互相交流下完成消费。

使追求国际人道服务与自然有机的路更加崎岖，且当所支援的对象不为台湾市场所熟悉时，更需要规则来供消费者辨识，如公平贸易认证。但是，如果小品牌执意追求这项标章，势必受到庞大的成本压力，很可能会无奈放弃，如是，倚赖口碑的方式来传播背后的理念更显重要。

相比之下，苑里掀海风蔺草编织就更无明确的品牌知觉了。曾有不知情者拿起蔺草杯垫打量了一番，再瞄了一眼价格，嗤之以鼻地冷哼：“相仿的杯垫，东南亚进口的才一半价格。”我们除了耐心地指出工法和原料产地质量的殊异外，也藉此机会向他介绍，在战争到战后的年代，台湾中部小镇“苑里”特殊的蔺编妇女文化；“掀海风”是一群曾离乡的苑里青年，数年前为了反对财团在住家附近设立大型风力发电机而回乡抗争，因此机缘返家，才进而重新发现家乡的底蕴，决心不再离开，常住在苑里，以复兴蔺编文化为志业。客人听了深表认同，又认真琢磨了一阵，选购了一片有着美丽镂空纹理的坐垫，“刚好最近在找椅垫，虽然有些超出预算，但能藉由购买支持到生产者，让社会有更多良善的事情，也很值得”。这段从被误解到相惜的过程，让我们更坚信由销售者搭起产销桥梁的必要性。

不过，这的确是个容易被挑战的“认证方式”——不够客观，偶尔还掺杂一些情绪；不够巨量，容易把一些细微的反应过度放大。即便如此，它仍不失为在不能面对面（Faceless）产销的消费行为下，作为互补讯息缺口（Information Gap）的一项手段。

这个概念的生成源自“农夫市集（Farmers' Market）”这种由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面的直销模式（Direct Marketing）。从农夫市集的理念上讲，它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举办，藉由最直接且原始的人际接触行为，不靠包装风格或标章认证，除了产品过往塑造的品牌认知外，更关键的是小型生产者的个人品牌基础，让产销两者在互相交流下完成消费。但落实到实务，市集通常囿于一处局限性的时空，再加上农事与销售本是各司其职的两项专业，一个不擅业务话术的农夫可能在销售场域失去自信，而有限的时间想要兼顾两者的完善，恐让两边的效益都下降，互相干扰下产生更多不值得的机会成本。

于是，我们从 2015 年起尝试以行动店铺的方式，利用一台可在城市间游走的小货车打破空间限制。虽然无法让各产品的生产者随车，但大伙在竹蜻蜓绿市集³像大家庭般共事多年，我们对于每位生产者已有清晰的轮廓，所以由我们替代本尊而作为销售者来介



绍，成为一种取长补短、折衷的方式。在街头游走两年有余，确实接触到一些从未参与过市集的新朋友，有部分也顺势转换成市集的常客。即便如今已有固定据点，我们仍未放弃“移动市集”，并且进一步在实体店铺内搜集更丰富的生产者塑像。这是一间期盼社会共好的选物店，选择了在衣食住行各领域与我们有一致理想的小人物，销售由他们的双手所完成的减塑生活什货、由他们的汗水所产制出的友善农产品与加工品。我们坚持向消费者描绘心里所认识的他们，也和他们一起讨论当前的市场偏好；同时，回归到推广差异化产品最核心的关键，这也是销售者和产销两端建立信任的重要历程。

脱掉人与人之间的科技冷漠，让疏离感少一点

随着科技的进展，商场会竭尽所能地利用大数据去算计每个人，精准地投其所好，也精算着每平方米卖场、每时每刻、每位劳工、每分投注，能否让消费者掏出更多的钱。

是否也架设一套“销售时点情报系统”（Point of Service，简称POS）来符合营业标准，小店确实斟酌许久，最终还是选择了传统的电子秤来计价，笨拙又低效。

3. 竹蜻蜓是一个由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心灵发电场课程激荡出来的团体，学员们致力于自然耕种、健康食材、在地消费等绿色生活形态的探索。希望透过农学市集的形式，联结在地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并在公益、环保团体及社区、大学的协力合作下，打造一个友善土地、培力小农的在地市集，追求永续自然的绿色生活环境。

所以小店宁可藉由落伍的电子秤拖慢一些速度，利用结账过程，真诚地简短关心消费者。惊喜的是，这段原先我们预想为单向付出关爱的小时光，久而久之，销售者和消费者竟一起成长，成为了彼此心灵和日常的导师，许多好意见和好东西在小小的销售场域中来来去去，我们甚至觉得收获的比付出的多上更多呢。

其实并非不曾考虑过使用条形码结账，咻咻咻的快速刷过，快点送走客人，快点将钞票落袋为安，将每单位营业时间的销售额极大化；而且也明白，无人商店、机器人的崛起，可以让我们省却心力去迎接他人的情绪。这听起来很诱人，在销售现场的工作者，自然得建构出一套复杂的应对异己的机制，有些卖场上的相遇令人窝心，但也不可否认，失望愤怒等负面情绪也普遍存在。倘若换成一套不断优化设计的程序，还能客制化地判读模拟出，针对不同类型客户的热情招呼，降低因售货员不完美个性产生客诉的几率，看似无懈可击。不过，也别忘了，机器人说出的得体应对，只是一段演绎出来的亲密关系。

或许再过不久，我们就会有一个存有大量数据千依百顺且从不会让我们失望的社交机器人。如果有这么一天，我们会不会因此而更难同理他人与自身的差异呢？这可能不是杞人忧天，在我们愿意与人多交谈几句话一段时间后，反而更深地观察到现代人的孤独感，他们亟欲利用采买机会，寻找人际连结，有时在卖场逗留多时不愿回家。不禁延伸开去胡思乱想：会不会往后想找一个人来聊天、来辩论，还必须得付费，让人际间的交流变成一个可悲的时代商机？

所以小店宁可藉由落伍的电子秤拖慢一些速度，利用结账过程，真诚地简短关心消费者。惊喜的是，这段原先我们预想为单向付出关爱的小时光，久而久之，销售者和消费者竟一起成长，成为了彼此心灵和日常的导师，许多好意见和好东西在小小的销售场域中来来去去，我们甚至觉得收获的比付出的多上更多呢。

入来坐吧

最后，大大地欢迎一番。“入来坐”（jip-lâi tsê）是一句台湾方言的常见招呼语，哪天阁下光临小岛，欢迎进来我们店里坐坐，食上一杯茶，感受脱掉各种包装的美好！

■ 凤娇 新村小商号的发起人与合伙人之一。



生命， 是不断 自我认识 与重建 的过程

文 | 陈云芳

我第一次听到“社区大学”这个名词，是在美国读书期间。当时学校有些学生，之前曾在社区大学就读，再申请进入正式大学三年级就读。社区大学的课程中，有许多关于技艺证照学习的课，提供给想要习得一技之长的民众，增加就业机会。回到台湾后，我在一所大学里工作，负责“推广教育”，适逢此时，台湾的社区大学也受到启蒙开始逐步发展。

我工作的学校位于农村，附近没有住家，放眼望去尽是连片的鱼塘和成群的鸡鸭。一所大学，除了为地方带来经济效益外，能否为地方居民带来不一样的改变？大学最大的资产是“知识”、“研究”与“专业人才”，而农村的资产是“农业”、“生态环境”、“地方耆老”。大学与农村，都是社会上重要的资产，两者之间的碰撞，引发了我强烈的想要突破现状的心愿与学习愿望。我阅读了黄武雄¹老师有关成人教育的相关文章，深受启发。在长期的教育学习体制中，我只有线性的学习思考模式，而开放式的学习，却是如此多元并富有创意，让我的小宇宙发生了大爆炸。我需要重新认识自己并且透过反思，去实践改变的批判历程，让自己真正成为一个人。

投入社区大学

投入社区大学的工作是一个不断实践和摸索的过程。透过观察农民的生活作息形态，农作与信仰，地方文化与关系脉络，寻找不同聚落与组织，透过各种切入点，每天与社区居民聊天，聊学习，聊社区大学，聊在地情感。得益于社区大学工作，我认识了很多伙伴，深受启发，学习反思社会结构、政策发展、全球议题，也包括自我觉醒，思考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些年来，社区大学以公民教育的“倡导”方式，想要达到整体社会的改造，而在抽象的价值观教育中，缺乏社会运动真正的关注与联结，会造成公民养成教育与达到社会改造之间还是有很大的落差。不过，在社区大学 20 年的脉络中，培养了许多人才，不仅是办学专才，而是有能力改造社会的人。若能以这些人作为种子，分散出



去开花结果，最后成为结盟伙伴，推广各地的实践行动及生活模式与组织，将可达到社会改造的目标。

看见家乡的环境问题与垃圾危机

我的家乡台东县，位于台湾本岛东南方，面积是全岛第三大，人口密度却是全岛最低，其中三成的人口为少数民族，是一个有丰富多元族群文化的社会，良善的子民是生活中最美丽的风景。家乡以农业及观光产业为主，没有工业发展及污染，这里的海水湛蓝，海天一色，空气清甜。我生长于农家，从小过的是顺应节气的耕作生活，长大后才离乡读书工作。

后来，离开工作了 15 年的社区大学回到家乡后，除了回归与家人一起的生活方式，也到家乡唯一一所大学兼课，教授有关“环境教育”的议题。在谈环境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并不了解家乡。以前在外地工作都会一直“望乡”，但真的“返乡”后，却一直没有回家的感觉。主要的原因是，我只是将家乡当成转换不同工作的地点，而不是为了回乡做些什么。认识到自己的态度问题后，我打破原有认知，重建回乡的理由，构筑扎根在地的生活。我热爱教育，一直

1. 黄武雄（1943 年一），笔名郑本、黄南，台湾嘉义县朴子市人，数学研究学者、教育工作者、作家、社会运动参与者。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推动台湾教育改革；1973 年编写高中数学实验教材，亲自到高级中学试教；20 世纪 90 年代投身社会运动，持续书写教育思想著作不懈，并于 1994 年发起四一〇教育改造运动；1997 年倡议普设社区大学，强调社会教育的公共性、通识性与根本性。2006 年与徐仁修、小野等发起台湾千里步道运动。

我常听到民众说，“我并不反对焚化炉，只要不在我家附近，若在我家附近，我一定抗争到底”。面对垃圾议题，政府与民众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很难进入理性的沟通，民众最后只能单一选择“要与不要”。

以来我所从事的工作都是教育，如何将教育的推动持续扩展到行动层面，实现社会改造的意义，这是我想做的事。

在社区大学累积的实践经历让我有很好的系统架构。在这样的脉络基础上我成立了“为环境教育，在环境中教育”的“禾耕生态环境教育有限公司”。取名“禾耕”，是感谢台东这块土地及父母辛勤耕耘养育了我，回到这块土地后，我也要为这块土地努力付出。公司第一个案子是与政府单位合作，将一座没有启用的闲置的焚化厂转型成为推动“垃圾议题”的环境教育中心。早年因政策推动与地方民意理念不合，导致焚化炉建厂完工后，地方居民上街头抗议反对，成为台东这淳朴社会第一场也是目前最大的一场抗争运动。最后，焚化厂成为闲置空间，十几年未曾启用。我花了两年时间让原本杂乱无章的闲置空间，重新改造成为环境教育中心，并培训工作人员及志工，设立中心的营运目标、行动方案及永续经营方针。

离乡二十载，家乡变化很大，看似依旧美丽，但已开始一点一滴地侵蚀受伤。为什么我选择“垃圾议题”作为工作及研究的重心，是因为台东没有启用焚化炉，垃圾只能以填埋的方式处理，长期堆积的结果是填埋场全部饱和。在公民意识逐渐抬头的当今，要设立新的填埋场并不容易。所以，家乡出现了垃圾处理危机：垃圾该往哪里去，如何处理。无论是哪一种处理方式，总会有不同派别的民众或在地居民反对，很难达成共识。我常听到民众说，“我并不反对焚化炉，只要不在我家附近，若在我家附近，我一定抗争到底”。面对垃圾议题，政府与民众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很难进入理性的沟通，民众最后只能单一选择“要与不要”。

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单一思考解决垃圾问题的同时，突破教育倡导的成效限制，推动多元面向的思考，促进议题与民众生活产生更多的意义与联结，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具体内容包括：

1. 环保倡导：此类的倡导工作，虽谈不上是公民参与的运动，却是很实际的可立即改变环境的行动，如减塑行动、垃圾分类、源头减量、自备环保餐具等教育倡导。

2. 政策倡议：我们会将研究观察提供给地方政府作为制定政策时的参考和建议，法规的制定搭配我们要推动的减塑行动的环保倡导，有加速的成效。

3. 组织联结：结合地方环保团体，共同关注垃圾议题的政策与

发展，参与相关会议，讨论出共识共善的目标。

4. 实际行动：公司认养了一段海岸，作为实践参与的场域，以净滩的方式，解决该海岸段脏乱的问题。

我们将环境议题融入工作，试图以教与学、政策倡议、组织联结及实际行动，获得民众生活感受的共鸣，推动社会改造。此外，我们也藉由这样的工作方式，提供社会实践的平台与工作机会，让年轻人拥有一个参与社会改造的实践场域。

净滩是教育也是环境行动

台东有美丽的海岸线，这些年来沿海地区多了很多开发，海岸上充斥着各种生产、生活垃圾。这些垃圾的来源，除了地方居民及厂商恶意弃置以外，还有一些是随着洋流从其他地区漂来的。为此，除了需要清理海滩垃圾，还需要从根源上解决垃圾产生的问题。每个人看到的问题层面不同，需要有不同阶段的解决方式，因此，我们的环境教育除了教育倡导之外，更强调公民参与的行动。

为了营造一个公民容易参与的现场，我们认养了台东县环境教育中心²邻近的海岸段，投入长期净滩工作。首先，我们规划了一门“海漂垃圾——减塑净滩行动”课程，先藉由室内的课程活动，说明目前所面临的垃圾问题，从全球到台东在地的危机。接下来，带领参与的民众去到海边，进行实地的净滩行动。结束后，回到中心做垃圾组成分析与称重记录，引导民众深入探讨垃圾来源。净滩的资料会持续累积，年终时，做总重量的汇整与净滩垃圾总类的排名。我们一年大约有 20 场次的净滩活动，对公司而言，这是一项很费人力及时间的义务工作，活动前需要准备净滩工具，活动时说明讲课，净滩后清理垃圾、清洗工具并汇整资料等。我们也藉此参与投入，让公司及伙伴们清楚公司的社会责任与个人责任。

这件事并不是默默在做，我们也会诉之媒体，透过各种网络公告达到宣传效果，让民众了解我们正面临的垃圾危机，分享的信息包括公司做了哪些净滩行动，有什么结果，有多少人参与，也会不断号召民众参与。我们的净滩活动平均每年有 1000 人参与，参与者包括邻近的学校、社区民众、机关团体，还有外县市的学校专门来

2. 台东县环境教育中心于 2016 年 2 月由台湾台东县环境保护局首创成立，主要以废弃物处理及资源回收等环境议题为教学目标。中心教学设备完善，课程丰富，并有专职环境教育人员，园区内以各式废弃物作为装置艺术，透过作品的呈现，让人省思废弃物与我们生活之间的关系，而厂区内的污染防治设备，更让民众一窥究竟，深入了解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学习参与，影响层面不断地扩大。邻近的社区居民一开始只是观望我们的净滩行动，而现在看到总有一群人不分冷热天气坚持参与净滩行动，也目睹了海岸环境的改变，社区乱弃置垃圾情况的减少，于是开始加入我们，守护自己社区的海岸，巡守严防乱弃置的行为。这种关系的改变，是从紧张、不信任慢慢发展为彼此携手合作。

在净滩过程中，我们会对净滩后的垃圾如何处理、为何有清不完的垃圾等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并与政府单位不断沟通，也会将净滩的科研调查数据作为向政府单位建言论述的依据，透过数据更真实地呈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台东是个很小的地方，我们透过净滩活动搅动了在地居民、学校单位、公务单位及 NGO 组织等，一起合作动起来。虽然无法奢求每一位参与的民众都有独立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但透过各类人群的参与，以分层解决问题的方式，让公共议题可以更普遍地被了解和关注。

年轻化的组织：创意，专业，活力

成立公司后，依自己当初成立公司的目标之一，我们捐出 1/10 的盈余用于支持年轻人组织。我发现有很多新的组织都是由年轻人创立的，他们具有较高学历，善于运用自己的专业学习背景，有丰富的创意点子，也熟悉各种网络平台的运用，擅长用这些技能和优势致力于垃圾议题的解决方案。他们所成立的并非 NGO 组织，而是工作室或公司。我很好奇，在如此竞争激烈的商业市场，以环境议题为公司的营业项目是如何营运的。

例如“海涌工作室有限公司”，由海洋大学环境生物与渔业科学系硕士毕业的一对情侣共同创办，主要以海洋废弃物为主题。他们除了长期组织净滩活动外，还串联企业、民众、政府共同投入减塑的行动。而他们主要的营业收入，除了通过企业委托执行的净滩活动获得外，还会透过环境教育讲座分享、体验活动、环保产品研发与零售等来增加。我问他们：“公司营运，辛不辛苦？”话刚出口，我就觉得自己像是说了废话。其中一位创办人回答说：“当然辛苦，也因为收入有限，所以公司目前请不起人，大小事都由我们自己扛起。”是啊，环境教育工作，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正因为如此，更需要全力专注在这个工作上，自己创办公司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另外，还有一家名为“RE-THINK”（重新思考）的公司，由原



新一代的年轻人组织，选择了不一样的生活与创业方式，既让自己可以“好好过生活，好好做环保”，也让环保可以成为终身的志业与事业。

来的非营利组织转变为工作室。发起人曾在广告界工作，拥有设计专业背景，因为觉得 NGO 在谈环境议题时很难突破同温层，宣传标语总是“爱护地球”“守护海洋”“地球只有一个”等八股宣言，让一般民众觉得很有距离感，也不知该如何做。后来，他善用设计专长，做了很多让人会心一笑或是很有感觉的文宣，内容是一些年轻人的用语，促使年轻人看了感觉不做环保好像就落伍了。因为设计很受欢迎，加上发起人本身也常参与净滩，后来就辞职专心做净滩行动。透过他的号召，许多企业与年轻人成为净滩志工；另外，他也协助企业策划大型净滩活动，帮助企业提升社会责任形象。

除了以上两个案例，还有更多的年轻人将环保落实在生活之中。他们不走传统的环保路线或街头抗争行动，更强调落实在公民的生活层面。这些年轻人有超强的号召能力与感染力，也有多元的发展模式，完全跳脱了老一辈 NGO 的做法。他们运用创意的思维激发更多民众参与行动。新一代的年轻人组织，选择了不一样的生活与创业方式，既让自己可以“好好过生活，好好做环保”，也让环保可以成为终身的志业与事业。

回首过去几十年，在社区大学和环境教育中心工作的时光给了我影响一生的转变，让我看见了不一样的公民参与模式和未来。

■ 陈云芳 台湾禾耕生态环境教育有限公司负责人，并参与运营台东县环境教育中心。禾耕致力于推动减塑、垃圾减量与分类及净滩等行动，培养关怀社会议题的年轻人，促进公司朝向社会企业的营运模式努力。

安德润大叔
的选择——
菲律宾乡村
建设研学的
观察与思考

文 | 何龙翔

何塞·黎刹 (Jose Rizal)¹ 曾说过,“如果一个人不知如何回看自己从哪里出发,他将永远到达不了终点”。2018年8月17日下午2点30分,飞机降落在西安咸阳机场。暂别一个月后回到这里,我不禁问自己:过去一个月在菲律宾做了什么?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什么让我发生了变化?第一个浮现出的感受是“对差异性的尊重和赞美”。这次在菲律宾乡村生活的经验确是独特的。当我允许自己走出原来的圈子,沉浸在中菲乡村建设关系与力量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历史脉络之中,不仅动摇了生活和工作中原本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和思想框架,也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得到发展,乡村建设工作也因此被赋予一层鲜活的世界主义色彩。

出行前的准备

在中国乡村建设学院²工作三年多,我一直协助张兰英老师³开展乡村建设的国际研究与交流工作,其中,深化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更是酝酿许久。在乡建大家庭日常讨论中,越来越多关于与泰国、缅甸、菲律宾、尼泊尔等国的交流,逐渐形成一种对东南亚国家民间社会的热情和关注。出发去菲律宾研学之前,我参加了北京大学外语学院菲语系和张兰英老师共同组织的工作坊,主题是“中菲关系和国际乡村建设”。在这个工作坊中,我像块海绵一般吸收各位前辈的经验和知识。这个过程呈现了菲律宾社会的整体图景,也让菲律宾乡村建设工作者和民间社会的日常更真切地浮现在我面前,像一张地图,给了我前行的信心,也让我在新的环境中不至于迷失。

我知道,要理解一个地方必须融入当地人的工作和生活,更进一步是深入到这个地方的历史脉络中去。我去研学的地方是新怡诗夏 (Nueva Ecija) 地区的一家合作社,马尼拉往北5小时车程。这家机构是菲律宾乡村建设协会 (Philippine Rural Reconstruction Movement, 简称 PRRM)⁴ 在这个传统的农耕区孕育的一家地方组织,接待我的人叫安德润 (Ka Andring),透过他的眼睛,我真正来到这个地方。



合作社发展的瓶颈

安德润大叔住进库尼生态稻米合作社 (Sustainable Cooperative of Nueva Ecija, 菲律宾语缩写 KOOL-NE) 的院子有七年多。这里是菲律宾著名的稻米之乡 (Rice bowl of Philippine)。因为从事生态农业和社区发展工作，他对附近的村镇都非常熟悉。二女儿桑德丽亚 (Sandria) 从附近的中央吕宋大学毕业，正在找工作。或许与父亲长期从事民间组织工作有关，她选择了发展传播作为专业。安德润大叔是合作社的经理，现在一家五口住在这个院子里，打理着稻米购销和加工的工作。

库尼是一家以稻米购销为主要业务的社会企业，有着现代化的组织构架和商业计划。他们与马尼拉的环保组织合作，预订和购买当地农民的生态稻米，经过收购、储存、初加工，最终送到大城市销售。来到合作社的第一周，我赶上了每月一次的稻谷脱粒。当时正值菲律宾雨季，几乎每天都下雨，趁着早上的阳光，我们把谷子一袋袋运上车，送到附近一个加工厂脱粒。这个加工厂是一个农机合作社，十之八九的农机都是从中国、日本和韩国进口的。当地人告诉我，在菲律宾能够生产合格机械的工厂非常少。搬运稻谷是体

1. 何塞·黎利 (1861-1896)，菲律宾民族英雄、革命先驱，被尊崇为“国父”。1861年出生于菲律宾内湖省卡兰巴镇。曾留学欧洲，出版《社会毒瘤》《贪婪的统治》等书，揭露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对菲律宾的残酷统治，号召人民发动革命推翻暴政。1892年从欧洲返回菲律宾，领导反殖民主义者的武装革命争取独立，遭到菲律宾殖民当局镇压，1896年以“非法结社和文字煽动叛乱”的罪名在马尼拉被处死。

2. 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于2012年3月在西南大学成立，研究范畴主要包括“可持续发展与乡村建设”交叉学科领域理论研究、乡村治理与乡村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乡村建设历史经验研究、地方创新经验研究与社会服务，并推动与国际先进经验的交流与合作。

3. 张兰英，就职于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主要从事可持续农业、社区扶贫与发展、环境教育等项目的管理和培训工作，近年在中国致力于在不同的平台上推动乡村建设运动，重点推动乡村建设人才培养和农民的组织能力建设。

4. 菲律宾乡村建设协会成立于1952年，是菲律宾国内著名的非政府组织之一，其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各领域的组织，包括国家领导人、议员、技术专家，社区组织，乡村带头人等，并且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网络。机构主要通过生活教育、人居环境改善、社会企业发展、公共卫生与健康、自我治理等综合方案，倡导和推行可持续发展。

让安德润大叔不甘的是，最近这些年合作社快速衰落，生态水稻市场萎缩，农民生产积极性锐减，活跃的社员不及之前的 1/10，以至于合作社只能以最低的补贴形式来支撑经营环节中的人力投入。安德润大叔纳闷，这么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怎么就做不起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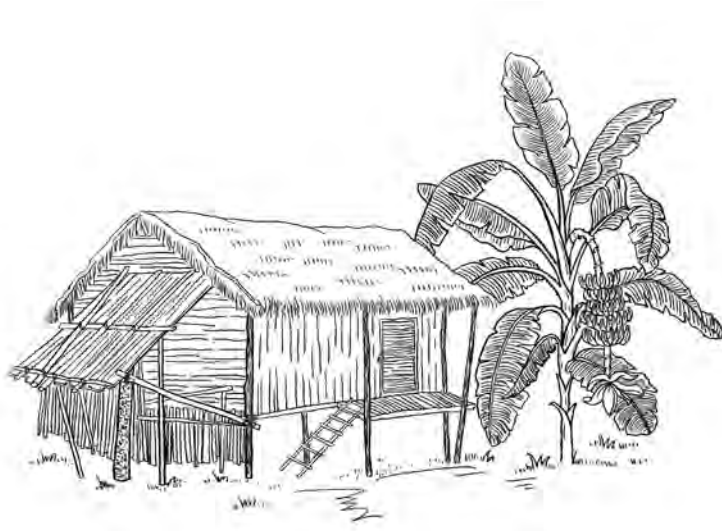
力活，脱粒则由大型机械自动完成。我们从早上一直忙到下午，刚结束工作，一场大雨如约而至。

作为由菲律宾乡村建设协会和农民组织网络卡利卡森 (Kalikasan People's Network for the environment) 共同孵化出来的在地合作社，库尼辐射周边五个区县的农民。向社会企业转型之前，他们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就在这个地区开展长期细致的社区教育和农业技术工作。菲律宾民间组织在 90 年代迎来了一波“小阳春”，当时合作社有全职员工 30 多人，几乎每天都有不同主题的农民培训，议题涉及妇女、儿童、卫生健康、可持续农业、小微创业及金融等。今天的热闹程度已经不如当年，合作社的收入也大幅减少，安德润大叔和我半开玩笑说：“在这里拿的工资少，还不如去穆尼尼奥 (Science City of Munoz)⁵ 开一家米店。”

从事社区发展工作 20 多年，安德润大叔身上有一种长期从事乡村工作所历练出来的自信与从容。然而，面对现实生活，我看出他这份骄傲之下也心有不甘。骄傲的是，成百上千的农民在这里接受培训，改变了观念，提高了生态农业技术，还获得了一定金额的贷款。通过长年累月的沟通 and 实践，在附近的村庄范围内培育出一个生态农业社会系统。让安德润大叔不甘的是，最近这些年合作社快速衰落，生态水稻市场萎缩，农民生产积极性锐减，活跃的社员不及之前的 1/10，以至于合作社只能以最低的补贴形式来支撑经营环节中的人力投入。安德润大叔纳闷，这么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怎么就做不起来呢。

丰富的社会机构形态

对于安德润大叔的乐观和健谈，他的妻子苏珊 (Susan) 功不可没。苏珊阿姨原是镇上一家私立小学的老师，细腻而温柔，总是悄悄地照顾好所有人。记得我住在合作社二楼的办公室时，她常常趁我外出就把衣服洗干净，整齐地叠放在床边。因为之前马尼拉空气糟糕，我的喉咙疼得说不出话，她就叫安德润大叔在院子爬树摘了一盆小酸橘 (Kalamansi)，做成果汁给我喝。苏珊阿姨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天吃饭前会张罗一家人为食物祷告。她对于教会的事务很积极，为回应村庄的需求还在教会内部成立了一个小额贷款服务的项目。



我每周都会跟着安德润大叔一家去教堂祷告。这个教会不过百人，彼此非常亲切。每次祷告结束以后，男性、女性、青年和儿童都会形成小团体，分享最近的生活体悟。教会的牧师若兰 (Roland) 是菲律宾水牛中心 (Philippine Carabao Center) 技术推广部门的员工，很有感召力，主持的新人婚礼，气氛神圣又轻松。听说我从事农业相关工作，他欣然邀请我去他工作单位参观，那里是慕尼尼奥科学城众多国家级科研机构之一。后来，一位在菲律宾水稻研究所的教友也带我去参观他的工作单位。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安德润大叔将他的工作和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和安德润大叔一家一起在合作社的院子里生活，他不仅照顾我的生活，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带我去参观周边的农业科技机构，包括菲律宾农机研究所、渔业和水生资源局、菲中农业技术中心等。

丽贝卡 (Rebecca) 是安德润大叔的同事，也是合作社的理事之一，主要的工作是组织妇女协会。因为慕尼尼奥城的市长是她大学同学，安德润大叔就问我要不要去见见市长。我想，能见到地方的最高长官对了解一个地方应该很有帮助，于是欣然赴约。丽贝卡带我走进市长办公室，见到了奈斯特 (Nestor) 市长。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原来在中央吕宋大学教书。他具有很强的综合处理信息的能力，接待来自不同地方的访客的时候，常常一边介绍自己的工作，一边快速地捕捉各方面的信息，并编织成彼此相关的网络。从办公室出来，我们还见到了一位曾在合作社工作的员工，现在正在市政府工作。在菲律宾，政府官员、科研机构、民间组织之间的人员变动是一件相当平常的事。

5. 穆尼尼奥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中部，是菲律宾农业重镇，辖区内有菲律宾稻米研究院、中央吕宋大学等八家国家级科研院所，是菲律宾唯一的科学城。

所有的社会工作，最终都会落实到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响。深入普通村民的生活，才真正触碰到菲律宾真实的社会。

生机勃勃的村落景象

安德润大叔帮忙联系了几位合作社的社员，安排我住进他们的家庭。非常感谢这样的安排，成了这次菲律宾学习中最有意义的部分。所有的社会工作，最终都会落实到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响。深入普通村民的生活，才真正触碰到菲律宾真实的社会。

来到不同的村庄，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乡村景观。我曾先后住进普通农户家、村长家、农场主家。贝拉 (Perla) 奶奶家以务农为业，有四个孩子。女儿出国打工，攒钱寄回家盖房子，房子建了一半，因为贝拉的丈夫生病，原本用于盖房子的钱只能用来买药，一家人为此住在尚未完工的房子。虽然家庭的窘迫一时半会儿很难改变，但贝拉在村庄里一直享有很高的认可度。因为和菲律宾乡村建设协会多年来的互动，她对于村庄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也被推选为村议员，参与到村庄各种事务的决策当中。

贝拉的大儿子约翰 (John) 和父母亲住在一起，是一个很有社会活动天赋的人。无论遇到谁，他都会迎上去热情地聊天，对于每个人在想什么似乎都了如指掌。住在贝拉家的两天时间里，约翰带我去认识村庄里的年轻人，并鼓励我自然地加入到年轻人的劳作和聚会中去。走访了不同的村庄，我发现在菲律宾，留在村里的青年人比国内要多得多。就拿这个村庄为例，青壮年人口占到村庄常住人口的 1/4。所以，村庄显得很活跃，有许多青年人的活动，也有许多青年人成群结队在田里劳作。看到这些让人感觉村庄的生机和希望。

我观察到，这仍然是一个前工业化社会，村庄周边很少有提供就业机会的工厂或公司，大部分人都以农耕为生计，保持着传统乡土生活方式。整个菲律宾的生产规模，也无法承载如此多的青年人，所以大量青年人还是以务农为主。其中有一部分选择成为农业工人，给其他农户提供服务。或许，这也是农业机械化很难推广应用的原因。勤奋的农人会去做农业工人，尽管收入比较低，一天工作 8 小时只有 250 菲币（约合 5 美元），但这也是青年人重要的收入来源。家庭经济压力也迫使农工群体非常珍惜这份工作。这片地区土地广阔、平整，本有使用农业机械的条件，然而机械会夺走农业工人赖以生存的工作机会，导致农业工人与机械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最后农业工人一怒之下烧毁了农业机械，以此方式对抗机械化。

我走访的每个村庄都有一个像花园一样的村委会。与衙门作风不同，每个村委会都有一个院子作为社区中心，里面有花园和板凳，有厨房和碗筷，有客厅和电视，还有篮球场，吸引了很多周边的村民茶余饭后来聚会聊天。干完农活的男人会去喝酒，女人会聚在一起玩宾果 (Bingo, 填格子游戏)，青少年则会去打篮球或桌球。村庄生活的人很喜欢社交，一瓶酒、一碗肉杂汤就能聚集起一帮子人。

多元文化融合的社会

有村民问我：“你在这里发现了什么？我们这儿是不是很穷？”随即有村民自己抢答：“Poor, but beautiful!”（穷，但是美好！）

菲律宾乡村贫富差距很大，而政府对于乡村的扶持力度又非常有限，大部分农民只能依靠长期租用地主的土地维持生计。对于这部分农民，他们的收入除去为整理土地、购买种子化肥、组织农工或租用农机等开销及贷款利息，几乎没有多少剩余。村民对我说，能够有闲钱去超市买衣服就说明这家人的生活水平算不错的，而大部分农民的生活还只在温饱水平。

另一方面，菲律宾的乡村生活又是美好的，保留着农耕文化的传统，既彰显一种前工业化社会的特质，又闪烁一种后现代的可能。菲律宾的热带海洋性气候适宜农作物生长，在家里的前庭后院种点瓜果蔬菜就足够一家人吃，基本生活能够自给自足。不像在马尼拉，不论外出做什么事情都得依赖钱。而且，乡村各个年龄阶段呈现有机分布，并没有因为工业化、城市化导致劳动力净流出。青年人、老人、孩子都生活在一起，大家都热衷于家庭生活，每天劳作，认真对待食物，邻里紧密沟通与协作。这些活跃的日常生活和细密的人际互动，使得菲律宾的乡土社会呈现出强大的日常性、精神性、凝聚力和生命力。

现代的非菲律宾是多元文化融合的社会。自 17 世纪开始，菲律宾长期处于被殖民的状态，深受西班牙、美国、日本的影响。参观何塞·黎刹纪念馆，可以看到西班牙殖民时代的菲律宾人，如何在何塞的启蒙下，逐渐形成民族自觉和文化认同，最终推翻殖民统治。但在新怡诗夏的走访中，始终没有看到天主教以外的宗教信仰。在活跃的世俗宗教信仰之外，日常生活中老百姓的精神空间又被大众

另一方面，菲律宾的乡村生活又是美好的，保留着农耕文化的传统，既彰显一种前工业化社会的特质，又闪烁一种后现代的可能。

媒体聚焦在以马尼拉为想象的工商文化和韩国的娱乐文化当中。在山区的塔亚波 (Tayabo) 村，我曾看见两位年轻女子带着一群孩子学习电视里的韩国明星手舞足蹈。韩国的连续剧、偶像团体风靡菲律宾，使得一般的青年人对韩星都耳熟能详。

贝拉的二儿子乔伊 (Joey) 在一家医院做保安，他希望换到中央吕宋大学做保安，因为工资比较高。等凑足了钱，他希望报读一个韩语学习班，等学会基本的韩语就去韩国工厂工作。在村庄还有不少人具有国外工作经验，我曾碰见过至少有两个人会说中文，能说流利英语的更多，多是女性。出国打工在菲律宾具有很长的历史，使得菲律宾具有庞大的国际就业介绍网络，让菲律宾人很容易找到国外的的工作。男性多从事建筑或能源工人工作，女性在国外从事家政工作比较多。有一次，还有个村民问我需不需要请家政人员，他希望女儿能够到中国去工作。她女儿 35 岁，现在在沙特阿拉伯的工资不高，月薪折合人民币只有 3500 元。对于菲律宾人而言，到另外一个国家务工可能就像中国的青壮年外出打工一般自然。从这个角度上讲，菲律宾又是一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社会。

未来的个人选择

农业工人的勤奋和抗争仍然扭转不了逐渐被机械取代的趋势。农场主使用机械可以节省一半的开支和时间。菲律宾以稻米为主要粮食，因生产成本低，国产稻米面临越南、泰国稻米的冲击明显处于劣势。若非人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农场主在经济理性的逻辑框架下，没有理由不选择机械。在工业化国家，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技术工人的竞争张力也在迅速增加。菲律宾乡村建设协会的主任马龙 (Marlon) 在他家乡金巴 (Guimba) 种了 12 公顷的生态水稻，插秧时会雇佣农民，以支持小农的生计，当然也可能是机械播种秧苗成活率低的原因，但收割时他还是会选择使用机械。

对于结婚、生子、教育、医疗这些基本生活之外的开销，青年人难以从土地上获得收入。现代消费价值观的导入，使得乡土生活自给自足的传统越来越弱。对青年人而言，教育、工作和旅行的需求增加，提高了他们对于现金的需求和依赖。在这种现实下，社区经济和家庭生活较以往更加脆弱不堪。

安德润大叔 20 多年前从事乡村社会工作之后就已经不种田了，大的两个孩子大学毕业后都留在城市工作，小儿子还在念高中。他们一家已经离开土地，离开农业。合作社微薄的收入让他们生活捉襟见肘，但是比单纯的务农还是要高一些。他期待能够进一步改善生活。在苏珊阿姨生日那天，他为家里添置了一辆二手轿车。我问他为什么买汽车，他说因为每周要去教堂，一遇到雨天路就非常难走，有车的话一家人在雨天去礼拜可以轻松些。自从买了车以后，他们去城里买菜也开车去，每次外出回来都计算汽油费。他的一位朋友托里大叔 (Ka Tolits) 说，其实安德润家并没有必要买这辆车，贪图方便一时，徒增了更大的经济压力。

对于村庄里的青年人来说，应该如何选择未来的道路？继续务农享受乡土生活朴实的乐趣，还是选择去外面的世界，经历城市的热闹与繁华？无论个人、乡村，还是整个国家，其实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身处其中，我也感受到自己身上在鼓荡着相似的能量。这是一种悖论，一面是宁静的整体，一面是澎湃的局部，而真正的生命经历却不能缺少任何一个面向。然而，选择不一定意味着落入悖论中的一方，我们可以期待一种具有未来感的乡土生活，具备乡土社会固有的文化和生态优势，又弥补经济发展上的弱势和不足。

生态稻米合作社未来会发展得怎么样？合作社的社员生活会改善吗？生态稻米的市场会扩大吗？安德润大叔会继续合作社经理的工作吗？离开慕尼黑，我心中多了一份挂念。或许，这表示我已经喜欢上这个地方。

后记

菲律宾之行对我作为国内乡村建设工作者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20 世纪中叶中国乡村建设领军人物晏阳初先生创建了菲律宾乡村建设协会和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简称 IIRR)⁶，开始在世界其他地区推广国内已经形成的乡村综合治理经验。张兰英老师曾于 20 世纪 90 年代在乡村改造学院工作了七年。若非因为这段渊源，我们很难近距离真实地接触并感受他们工作的气息。当我们埋头苦干时，若是能将自己所做

6. 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正式成立于 1967 年，由晏阳初领导的国际平民教育运动促进委员会主持创办，旨在将中国、菲律宾具有活力的乡村改造经验，推广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

的工作放入更广的地域和历史的国际经验框架中去理解，方向感会更清晰地展现出来。这种方向感中，蕴含着浓浓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感。我对菲律宾乡村建设工作者所展现出的专业性和工作热情印象极其深刻，并充分意识到，让工作主动地融入自己的生命之流，并且参与到更广泛的社会变革中，这样的工作才具有坚实而灵动的内生动能。专业性给一项工作构建了健硕的形体，而主动性则赋予了这项事业敏捷而持续的灵魂。



■ 何龙翔 北京慈海生态环保公益基金会行动源计划项目协调员，毕业于英国舒马赫学院，获得整体科学硕士学位。参加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农村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计划”至今，协助返乡青年成长和乡土文化再生，探索个人与组织在转型过程中对生态智慧和多元文化的创造性实践。

第三部分

解读

《鸡》—— 叩问现代生活

文 | 顾晓峰

听古苍梧老师¹谈商禽²轶事，说到这位满怀赤子心的已故台湾诗人，一次春游香港中文大学，抬头但见杜鹃漫山盛开，即兴开怀：“当以鸡蛋炒之。”在诗人心中，自然、诗与生活融而为一。

我们大概都吃过鸡，但其背后的文化和社会意义是什么？商禽在《鸡》这首散文诗中，叩问现代生活的真面目。他从自己常用的“梦”和“黎明”意象，脱生出“人类制造的日光”，展示满有张力的诗质。

鸡

星期天，我坐在公园中静僻的一角一张缺腿的铁凳上，享用从速食店买来的午餐。啃着啃着，忽然想起我已经好几十年没有听过鸡叫了。

我试图用那些骨骼拼成一只能够呼唤太阳的禽鸟。我找不到声带。因为它们已经无须啼叫。工作就是不断进食，而它们生产它们自己。

在人类制造的日光下

既没有梦

也没有黎明

吃和生产——矛盾的一体

在商禽这首短小隽永的散文诗中，“雄鸡一声天下白”的昂扬动物，被现代工业处理成纯粹供消费的快餐品。鸡这种形在神亡的命运，也是现代人的写照——我们不懈地工作，以求自我增值和财

富累积（多像鸡努力地长肉），同时也如鸡啄食般忙碌消费（在物质和知识上）。然而，这一切似乎都只为了指向更高的生产力。我们既生产，同时也供别人和社会消费。我们在自制的文明中被阉割，沦为一种“物”。

诗以平淡、陈述的语调开始，看似写实。“星期天”、“公园”等时间地点，又予人一种宁静放松的气氛。不过，到了“静僻的一角一张缺腿的铁凳”，诗人却以有点拗口的句子拖慢节奏，然后一下子把冷不防的读者，引入一个诡异的迷境——铁凳这般沉重，缺腿还能坐得稳吗？接着，吃者从嘴里的鸡联想到鸡啼，又神经兮兮地尝试把吃剩的骨块拼成“能够呼唤太阳的禽鸟”。结果是找不到声带，因为鸡的啼叫，已没有价值。原本趁假日在公园里轻松进餐，忽然感悟到进食和生产是一对双胞胎，读者和诗中的食者，还能有当初“享用”的心情吗？

商禽认为，诗的本质，是要把意象绘出³。这首诗的核心意象“鸡”，同时具有两种身份——快餐鸡和呼唤太阳的禽鸟。这种对立构成了美国诗人、文学评论家阿伦·泰特（Allen Tate）所说的内部张力（Intension），大大提高了诗的力度。但诗人高明之处不仅体现于鸡的“命名的分裂”⁴之上。诗中缺腿的铁凳、无梦也没有黎明的日光，并非只作为情景的配搭，而是和没有声带的鸡一样，指向某种缺失，而这些缺失，偏偏是它们赖以存在的核心特征。当所有意象都服膺于缺失的存在之下，张力的强度便从矛盾中生成，令诗的质地更饱满有力。

人造日光与星期天

在诗的最后一节，出现了“梦”和“黎明”这些商禽诗中常见的意象。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诗往往有一种拒光趋暗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诗中脱生出“人类制造的日光”这个新意象。但它到底指向什么呢？答案就在诗的开首——“星期天”。“Sunday”如直接翻译成中文就是“太阳的日子”。自古埃及开始，人类便“制造”了这个日子。在当今社会，周日往往是一周工作过后休息的日子。不过，这个“人造日光”在诗人眼中既无梦，也没有黎明，说明它并不具有潜意识或理性的特质，只是空白一片，当然也用不着鸡啼。

1. 古苍梧，原名古兆申，号苍梧，笔名傅一石、顾耳、蓝山居。广东茂名。1967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1969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先后担任《盘古》《八方》等刊物的执行编辑。著有《铜莲》《备忘录》《一木一石》等。

2. 商禽（1930—2010），原名罗燕，笔名罗砚、罗马、壬癸等。四川珙县人，台湾诗人，创世纪诗社成员之一。曾做过编辑、码头临时工、园丁，卖过牛肉面，后于《时报周刊》担任主编、副总编辑。16岁从军，在动荡的岁月中走遍中国大陆西南各省，一路搜集民谣、试作新诗。1950年从云南移居台湾。翌年在《现代诗》上发表诗作。1956年加盟纪弦组织的现代派阵营，之后加入创世纪诗社，成为台湾超现实主义诗人的典型代表。1962年创作诗集《长颈鹿》。

3. 商禽：《商禽世纪诗选》，尔雅出版社2000年版。

4. 欧阳江河：《命名的分裂：读商禽的散文诗〈鸡〉》，《诗探索》2000年第1-2期。

鸡这种形在神亡的命运，也是现代人的写照——我们不懈地工作，以求自我增值和财富累积（多像鸡努力地长肉），同时也如鸡啄食般忙碌消费（在物质和知识上）。然而，这一切似乎都只为了指向更高的生产力。

我们不禁会怀疑，这种带有缺憾的休息日，是否只属一种伪装？就如凳本是供人歇脚的，但缺腿的凳却让坐的人提心吊胆；食物应该是滋养生命的，鸡的开怀大嚼却把它推向死亡；我们一想到休息也是为了生产，明天又得工作，星期天恐怕未必可以好好地过，正如许多都市人在假期的尾声，都会生出一种莫名的焦虑，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的休息。商禽这首诗的力量，就在于将这些矛盾并置陈列出来，藉此叩问这个时代的吊诡和荒谬，也提供了多层次的阅读体验。

商禽的散文诗往往采用故事式的叙事方式，以时空开端。《鸡》这首诗，诗人也以戏剧叙事开始，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星期天的公园最初让人感到轻松，直到读者被安排坐上“缺腿的铁凳”后，一种悬空的触感便油然而生。午间快餐应该是寡味的果腹品，但诗人却不无讽刺地要我们去“享用”。当我们顺从地和食者一起“啃着啃着”鸡块时，诗人已笔锋一转，跃出了这个场景，去寻找那缺失的部分，同时也唤起我们对鸡啼的记忆。此后“找不到声带”、“工作就是不断进食，而它们生产它们自己”，也无不带有一种戏剧转折的震撼。这些意象叠叠在读者心中的剧场上演，让人不得不深思自身的处境。

商禽常被归入超现实主义诗人，但在《鸡》这首诗中，虽然有一些诡异的场景，但就整首诗而言，并没有超现实主义强调的潜意识写作，或者梦笔类的书写。因此，这首诗不应归类为超现实主义作品。相反，诗中叙事的语调相当理智，甚至是冷峻地道出“工作就是不断进食，而它们生产它们自己”，营造出铁一般沉重的事实感觉。作者在诗中运用简约有力的意象和语句，对人类存在的处境进行深刻探讨，感情隐而不发。

人如鸡命 物哀其类

“商禽”这笔名，本身就可以被解读为“受伤的鸟”——“商”与“伤”谐音，“禽”即鸟也。商禽此诗，颇有物哀其类之意。在这个经济发展至上的社会，几乎每个人都吃过快餐鸡，但这种最廉价的经验，也往往最易被人忽略，只有商禽这般敏锐的心灵，才能把它化成诗的题材。

《鸡》这首诗，让我们照见人类的处境，也启发我们思考生活的本质，在做生产和消费之物，与复为有灵有情有感有肉的活人之间，作一抉择。

《鸡》这首诗，让我们照见人类的处境，也启发我们思考生活的本质，在做生产和消费之物，与复为有灵有情有感有肉的活人之间，作一抉择。

